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

查建英笔下的弄潮儿

查建英

作家，北京人，1978 年-1987 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 年回国，90 年代返回美国。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Tide Players》、《China Pop》、《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等，2003 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China Pop》被美国 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 年度 25 本最佳书籍”之一。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查建英/著

作家出版社

1991 年

五年不见。

上一次见到作家查建英，还是 2006 年。那时，她带着古根汉姆写作基金回到中国已经 3 年，每年在纽约和北京各住半年。

早在 1995 年，查建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非小说英文著作《中国波普》（China Pop）在美国出版，她描述和分析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该书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杂志评为“1995 年度 25 本最佳书籍”之一，还被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

1981 年秋天，查建英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去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留学；1984 年又拿着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英语硕士学位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在夏志清先生门下攻读比较文学，同门的有日后成为魏晋文学专家的唐翼明（历史作家唐浩明的兄长）。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开了 1980 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紧随其后。

旅居纽约、芝加哥、休斯顿之后，查建英和家人于 2000 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两年。此间查建英一直用中文为香港媒体撰写文章介绍北京，用英文向欧美介绍中国。近年的一些长文陆续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刊发，《读书》、《万象》也让她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字还乡”。

回到北京本来是为了新的写作计划，不料与 1980 年代文化热中的一批“现象级”人物对谈，谈出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 2006 年 5 月在三联书店出版并迅疾畅销的访谈录，正是我五年前第一次采访查建英的缘起。

不见查建英的这几年，不时“见”她出现在《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席上。这是她获得“在场感”、参与国内公共讨论的重要途径。

除“写作个体户”之外，查建英另一个重要身份是纽约 The New School 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印度开了一个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就是中印比较，和中美比较很不一样”，查建英这八年来组织了大量中印比较的学术研讨，在纽约、北京和孟买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这位“地理文化决定论者”近年来格外关心的是，印度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殊途同归。

查建英 1987 年本来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口试，领了笔奖学金，说是要回中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革’小说”。临别前，时任比较文学系主任的萨义德曾疑惑地问：“你是不是真的还会回到我们这儿？”果不其然，查建英最后没有写出博士论文——夏志清先生或许有些失望，没有像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父亲查汝强那样走上治学之路，她选择了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写作——查建英自认为不适合做一个站在讲坛上的大学教师，“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再次见到查建英是 2011 年年底，她在美国出版的新著《Tide Players》（《弄潮儿》），刚被英国《经济学家》评为“2011 年最佳图书”。该书集中采写了张大中、孙立哲、潘石屹、张欣和王蒙、张维迎等企业家与知识分子，试图立体描述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

于是，围绕着这五年的“见与不见”，我们再次一番畅谈。

《弄潮儿》

（ Tide Players :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 ）

Jianying Zha/著

The New Press

2011 年 3 月

访谈

Q=燕舞 A=查建英

弄潮儿

Q: 《八十年代：访谈录》掀起热潮后，您更多地回归和介入国内思想文化界了。这几年在《纽约客》刊发的那些长文，都被国内网友第一时间主动翻译过来，像《纽约客》2010 年 11 月 8 日封面头条那篇写王蒙的《国家公仆》。而 2011 年国内出版的《纽约客》前任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不少媒体将其排在年度图书评选榜首。描写中国最深入的非虚构作品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美国记者，这多少值得中国记者和写作者反思吧。

A: 何伟是《纽约客》前些年的驻华记者，是专职记者，我是自由撰稿，跟他们没有长期合约。现在欧逸文（Evan Osnos）接任，他们都得一年内写几篇，我是没有的。最早，他们跟我约稿时，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让我改，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思路改，也不愿意由他们来给我定选题，我是一个天生的个体户，最后就变成自由撰稿了。

我 2011 年 4 月出的这本新书《Tide Players》（《弄潮儿》），还没有中文版。昨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碰见“东西网”和“译言网”的创办人赵嘉敏，他说我这本书在大陆全部刊发不可能，但他想组织翻译部分章节发表网络版，还说国内现在也有一些读者已经开始从网上的“苹果商店”（Apple Store）买书了，买那些国内买不到的书。

我这个集子里有三章是《纽约客》发表过的，但不是《纽约客》上发表的那个样子。比如写王蒙那篇，实际上《纽约客》删掉了将近一半，所以《弄潮儿》里面就长出来差不多一倍。《纽约客》只能是那么长，不可能再长了，我这几篇都是《纽约客》当期封面的头条，给的长度已经是最长的了。

其他几篇是没发表过的，就是专为这本书写的。《弄潮儿》是一个集子，基本上是人物系列，所以给《纽约客》的那几篇人物我收进去了。

Q: 《弄潮儿》里主要写了哪些人物？

A: 《弄潮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家，即 **entrepreneur**；第二部分是 **intellectual**，算知识分子、知识人吧。我对知识人的定义比较宽泛，第一章是北大，我的母校。源起是一个个案，就是当年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 2003 年从美国搬回北京来，就碰上北大改革最白热化的时期，所以那是全书写得最早的一章。这个争论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又追踪，一直到前不久，这个改革有点无疾而终了。张维迎是这一章的主要人物，但里面是北大教授的群像：我在中文系的师兄比如陈平原、刘东，还提到甘阳、张永和这些人。王蒙那章的主要人物就是王蒙。张大中那章的二号人物是黄光裕，还有张大中的妈妈王佩英。

Q: 我收到过王佩英慈善基金会赠送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和《王佩英评传》，其中收录的权威资料显示，文革受难者王佩英（1915 年 3 月 14 日～1970 年 1 月 18 日），终于在 2011 年 6 月 9 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

A: 张大中其实很希望我写他妈妈为主，而不是以他为主，但是出于英文读者的考虑，我说还是得以你为主——你妈妈在里面只能是二号角色，因为她的事情是一个历史冤案，用中文写意义更大，跟美国读者讲起来比较费劲。

企业家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是孙立哲（亦可参见《北京青年报》2011 年 10 月 21 日报道《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网址为：<http://bjyouth.ynet.com/3.1/1110/21/6371869.html>——采访人注），你们这个年纪的可能不知道，他是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钦点的五个模范知青之一，是全国最著名的赤脚医生。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1969 年初下到延安插队，之后变成一个“神医”，特别有天赋，在当地治愈了无数农民。可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就把他打下去了，他的命运起伏极大。

后来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1982 年出国，以后转行变成了一个出版家，又回来投资。中信出版社原来很糟的，他参与之后带来很多版权，出了很多畅销书。像《谁动了我的奶酪》、哈佛商学院的经管系列，都是他最先带动起来的，可他们后来发生了一场纠纷，他又被踢出去了。孙立哲是一个很“神”的人，精力非凡，一边经商一边满世界飞去修各种学位，业余时间还免费给人治病，甚至自己买进口药，送给贫穷的病人。很多这些老知青一代的人，一方面对知识，一方面对服务社会，有很深的情结，单是财富不能满足他们。

还有一篇是《纽约客》上发表过的，关于潘石屹、张欣的，就是以他们这个“土鳖”+“海龟”的组合，以地产这个行业为中心写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编

2006 年 5 月

企业家的 human story

Q: 写王蒙那篇我读得比较细。您和王蒙 1990 年代初就认识了，私下接触也挺多，但企业家这块儿可能就没那么熟，是后来再去访谈？

A: 我对企业家的熟悉程度也都不一样。写潘石屹和张欣，开始认识的时候并没想写他们，是先认识张欣，就是几个女朋友洪晃、张欣、刘索拉、宁瀛和我，这五个人老在一起吃饭，号称“姑奶奶俱乐部”，一起神侃就认识了。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张欣是干什么的，刚从国外回来嘛，第一次跟她一块儿吃饭，她说“我是盖房子的”。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潘石屹，才开始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后来才决定写他们，其实已经有点像朋友了，那时候再访谈就不是纯粹地拿着录音机，因为已经有一个阶段的了解。

孙立哲的第一任太太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关系特别好，但是她很早就得癌症去世了。我那时候就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混，他们都是老知青，我是班上最小的，因为我跟他太太好，所以有时候带着我玩，一块儿吃饭。史铁生、孙立哲都是一个圈子的，都特别熟，很多都是清华附中的子弟或者父母都是清华的海归教授。因为是陕北知青，他们回城后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后来孙立哲的太太去世了我们还联系着。

其中，最晚认识张大中，也不是我找他要写一篇文章，而是他找我。他的一个代理律师是北大法律系的，也是一个海归，他送给张大中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张大中那时候（2007 年）刚把他的公司卖给黄光裕了，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有兴趣认识我，这个律师朋友就把我们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吃饭当中我才发现他有这么一个妈妈，由此对他更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企业家，好像也没有那么特别。

吃完饭以后他告诉我，他最有共鸣的是《国家公敌》，《八十年代：访谈录》他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有那么一个哥哥，他有那么一个妈妈，他愿意跟我谈。这样才约了一起再聊天，越聊越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把他作为故事主人公写篇英文的文章，最后我跟他也变成朋友了。关于她妈妈当年受迫害致死的采访，我推荐了郭宇宽去做，还给他们提供过见证人，恰好我的一个老朋友是他妈妈被押送刑场前的万人公审大会的在场者。

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可能他本来不是朋友，写完往往就变成朋友了，因为我不是一次性采访，会观察得比较长；或者他本来就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值得写，他也同意，我就写了。你看《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很多年了，这种访谈就像朋友谈话一样。

Q: 但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同质性，选题可能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

A: 对，这个限制在于，我的写作前提是只写我熟悉的，我熟悉的当然就跟我平常的生活圈子、感兴趣的范围有关系。比如说，企业家其实是我相对不熟悉的，在我来说还是出了一下这个圈子。但是，我选的这些企业家，其实也是要有一段时间去了解，我不太愿意写一个没有深入了解的人。而且，就是写企业家，我一般写的是 human story，是从人性的角度，以

他们的成长和心路历程折射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历史的瞬间，而不是只写他们怎么赚钱、怎么成功，那种励志故事更有商业性、更流行，但那既非我的强项也非我的兴趣所在。

忠实于真相

Q:《国家公仆》追问得特别好，“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还是一位辩护士”，王蒙看到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A: 发表之前他没有看过。这是美国的行规：发表之前你不能先给你写到的人看稿，否则会被认为你可能受到写作对象的影响、下笔不客观中立。发表之后，《纽约客》上的英文版和后来的中译版王蒙都看过，未予置评。但我们的友好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个态度我非常理解。我甚至觉得有点庆幸，因为很多人来问我他什么反应，他真的是一句没说，我们照常来往，还一起上《锵锵三人行》；平常我们也有联络，发发电子邮件什么的，一切正常。

我觉得他不作评论挺好。有些时候，不说话最好。他知道这是我的文章，我会文责自负。无论他怎么反应，这个文章已经出来了。

Q: 您写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顾虑？

A: 我其实是很担心的，因为已经认识快二十年了，但也不能说是那么近的朋友，应该说是我很尊重和喜欢的一个忘年交。毕竟，他有官场的经历、“放逐”新疆 16 年的右派经历。我当然非常担心这个文章出来以后会对他有伤害，如果他从个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或者是这个文章引起的议论影响到他某些方面，我都会很过意不去。但是，作为作家的第一考虑，就是我要忠实于真相、忠实于事实，我希望能尽可能的客观。

他又是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物。为这么一篇文章我看了很多资料。他是一个高产作家，好多东西我都要看，他那三大本回忆录我看了两遍；然后跟他谈，跟他周围讨厌他的和喜欢他的、佩服他的和感觉非常复杂的人都谈过。最后写出来的其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觉得还算实事求是吧。

但是文章出来以后，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喜欢王蒙的人觉得我下手太狠了，认识他这么多年，怎么能这么狠呢？不喜欢他的人，很多右派的朋友觉得我太同情他了，把他写成了忍辱负重的那种感觉，认为最后给他的评价其实相当高，太体谅他了，没有把他的所谓“嘴脸”写出来，还不够负面。

这是两极的反应，但还是有很多作家朋友、美国的读者，觉得把中国的复杂性写出来了。

Q: 文中也提到，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或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您都会写邮件询问他的相关态度。比如，他在 2009 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演讲，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这引发国内互联网上的一片嘲讽，您事后立即发邮件表达对此场争论的失望，他简洁地回复道：“没事。随便。我顾不上这些事，也早习惯了。谢谢。”可在另一些更重要的历史时刻，您去信询问他的态度，他就“没有任何回复”了。

A: 这些都是事实。他为什么不回我，也可以理解。他回什么、不回什么，就很说明他和他所处的语境了，我放在那儿就行了，用不着再过多地评价了，事实本身是最意味深长的。你看了以后，对这个人物的印象是更偏负面了吗？

Q: 没有。我其实很少看虚构类作品，以前对王蒙的文本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他特别喜欢用排比句，这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煽情，有时甚至是一种语言暴力。他的回忆录中与访美有关的章节我倒是研究过，当然因为直觉或某种偏见，我觉得他比较圆滑或者说有“生存智慧”。

A: 太多的人这样说他了，其中很多人自己也未见得有多么勇猛的表现。我持保留意见吧。

对他我已经非常感谢了，我写这么长一篇文章，在这么长的过程中没有给他看过一个字。《纽约客》有非常严格和繁琐的查证程序，他们直接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也不会告诉他这个文章是怎么写的，不可能给他念的，只会说这里面直接引用到他的话，问他说没说过这句话，这个话准确不准确。

他能够给我这么大的信任，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而且，文章出来以后，他并没有说什么，顶多说过感谢我花了这么多心血，这还是在看文章之前。

Q: 写作期间，您要跟他谈什么，都会提前告诉他吗？

A: 有过一次录音访谈。他知道我在写，但是怎么写、写成什么样，他完全不知道。

其实这些年我在挑选中国人物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精彩的、可以写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些我已经花了大量工夫准备甚至写了初稿，最后我都放弃了，因为考虑到这个被写的人可能承受不了我这种比较“狠”的写法。所谓的客观笔法其实相当重的，脸皮薄一点的人都受不了。

写王蒙的文章出来以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给我来了一封 E-mail，他刚看了翻成中文的版本，说你居然写完这个还可以跟王蒙吃饭，简直不能想象。他就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他说这些年（写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个案时）是写一个就得罪一个就断交一个，所以不能想象我和王蒙还能吃饭。

我说，这正说明王蒙的大度，而且我的预计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我觉得他完全承受不了，这篇我就不写了。我想了半天，觉得他可以承受，他经历了那么多，那么稳妥和看透，会看得出我没有恶意，这么一篇文章也不会给他政治上带来什么打击。顶多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多少年来就是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承受得住，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有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所带来的特权，斤斤计较；另一些人把他捧上天，一天到晚叫他大师，让人起鸡皮疙瘩。这两种我都不是，是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这点，也能接受我对他的一些批评。

Q: 《弄潮儿》里写到潘石屹和张欣的部分，他们也该读到了？

A: 发表以后，他们才读到，之前没读到。《纽约客》给张欣打过电话，没给潘石屹打电话，

因为他不懂英文，那时候《纽约客》还没有中文核查的专职人员。到了王蒙那篇，他们有了，就派了一个小时移民去美国但中文很流利的人来查证。

《纽约客》向张欣查证过，还向相关的人查证过，但他们都是发表出来后才看到的。我说的客观也只能说是尽可能的客观，有些东西我在选材的时候也是要回避的，比如隐私；比如涉及腐败——你写了就可能把这个人抓起来了，那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得做一个考虑：他的腐败是不是到了某种程度，还是只是大环境的一个反映？如果只是一个反映，你必须写到。

地产业有多少暗箱啊，我其实写了潘石屹、冯仑他们万通的第一桶金在海南是怎么淘的，当时整个环境都很疯狂，有点像开发西部时候的土匪。到后来拿地、拍地什么的，这在中国有很多暗箱、潜规则、权钱交易，要搞政府关系。但是我不直接写到他们哪一次如何操作这么具体，我只是写了地产界的一般状况。我说的客观，也是有边界与分寸的，是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把握的。我不能因为发表一篇文章而去伤害一个人。

Q: 以前采访您，好像您说上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那像微博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发展得这么迅猛，您上吗？

A: 我 Blog、微博都没开。前几年新浪曾邀请过我，我没接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那个时代的人对没有隐私这件事有一种很深的反感，什么《雷锋日记》之类的，就是为了给别人看。“隐私”这个词，以前汉语里听不到的，现在开始捡起来，我就非常在意，你私人写日记就不要放到网上去了。Blog 已经有点儿这种嫌疑，现在发展到更琐碎的微博。老在那儿发布给别人看，你这一天在干什么、想什么。如果真的发表文章，应该是最公众的，不是私人日记、随想什么的。可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理障碍，我不习惯这样，这个公与私的界限太模糊了。

在这个高科技、大批量快速生产的时代，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80 年代刚去美国上学我就开始用电脑，这都多少年了，我还是把电脑主要当作文字处理机，除了写、编文章，仅限于收发 E-mail，近年才开始用网络做研究工具，查查资料什么的。

我本人对文字还是很挑剔的，对随手就写然后公布出去，是不太习惯的。我是一个低产作家，有些人很高产，我很佩服，但也发现好多人高产高得不太讲究。芝麻西瓜，什么都抓一把；一泻千里，泥沙俱下。文字应该是一个讲究的东西，应该沉静下来用心对待、舍得花时间打磨，应该沉淀、少而精。至少这是我自己更愿意选取的写作态度。也许文字才是我的真爱吧。如果你真爱一个人，你自然会珍惜、检点、细致地对待他，如果随随便便，不讲究时间地点、也无所谓装束举止，天天破门而出招摇过市，那不是个糙人或者一个轻狂滥情的薄幸之徒吗？

所以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开微博、开 Blog。但是，我不否定开微博，因为它由是各种人组成、各种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网络之外的言论、媒体空间很有限，有些公众事件的报道和讨论，只有网络和微博能做。在美国做，就没多大意义，美国主要是用它来社交，大家约会啊、八卦啊，中国当然也有一大批这样的，但微博在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透明度、自由度都很高的民间监督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尊重它。

Q: 尤其像解救被拐儿童或其他公共事件的讨论，它即使在微博上被删掉，但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相关微博内容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传播出去了。

A: 而且会被成几何级地无限转发。我也有不少“公知”朋友开微博，他们的言论要不受限制地直接发布出来，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报纸上开专栏受很多限制，在电视上说也受限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只不过我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性格使我不太适合选取这种方式去参与，所以选取了写作，这种方式是我能控制的。

写作完全是个体的事，我很少与人合写。像《八十年代：访谈录》我要跟每一个受访人合作，这在我是一次例外。我还参与过我工作的研究所编辑的论文集。其他时候我都是单干户，英文书也都是我自己写，文章也没有合写的。

Q: 我也上微博，但有时又发现，国人在很多场合谈论的话题都来自微博，就觉得我们的话语资源太过贫乏，似乎不谈论微博上的话题就无话可说了。

A: 对，但即使不开微博，也能听到无数的信息，所以我不缺这个。其实，我潜水去微博上看过，我注册了一个账号，看了一段连自己的账号都忘了。他们都说会上瘾，我根本不上瘾，看了看就烦了。我不看微博，信息也都到我这儿了。那些最敏感、最热点的事件，从别的渠道，从电子邮箱，很多人就转发给我了，或者在饭桌上就可以听到。

Q: 前面的谈话中，您特别多地讲到“吃饭”，饭局是不是也是您回北京这几年了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A: 当然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好吃之徒，所以好饭局、好饭馆我是不太容易拒绝的，在饭桌上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这些人对这些消息的态度。

信息源是多方面的，关一个，其他信息也足够了。现在我觉得还得关，你看我这里好多杂志寄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好多信息是重复性的、不必要的。你的脑子像一个装满太多杂物的阁楼，塞满了，反而你该看的书、该想的事、该认真对待的人，你没有时间也装不进去了。你成了信息的奴隶，对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反而麻木了，整天跟着时事跑、围着八卦转。所以，微博对我来说是不必要的。

Q: 梁文道有个说法，他不愿意跟人在外面吃饭，因为在座一坐上来就都低头拿着手机发微博。

A: 这太恐怖了，我最害怕这种人了，如果我的同龄人里有这么一个人，那更恐怖了。年轻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他们就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年轻人也容易不自信、爱跟风，需要群体承认、确认他。可是到了这种“微博控”的程度，坦率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病，就像“照镜狂”。如果一个中年人，一天到晚生怕一群陌生人不关注你、生怕“掉粉”，完全被你的所谓粉丝团控制住了，你还有什么自我，这也太可怜了。

而且这种行为实在太不讲究、太糙了，貌似他是高科技能手，他很 in，但其实连基本的教养都没有，恶俗无比。这种人出现在饭局上何止是败兴，应该请他走路，out！因为他不经别人同意就把私人场所的门打开，搬到网络上的公众场所去了。

《中国波普》(China Pop)

Jianying Zha / 著

The New Press

1996 月 4 年

印度是中国的镜子

Q: 我最关心的还是您作为纽约 The New School 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因为中印比较研究是国内近年来的一大热点。

A: The New School 刚创办印度中国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受聘参加了。2004 年开始讨论，2005 年初正式成立。开始我对印度完全不了解，那时候印度也不太热。2004 年，美国一个大基金会投了一大笔资金，放到这个大学里面，他们要找一个驻中国的、一个驻印度的代表一起来做项目策划和管理。此前一年，2003 年我拿到了古根汉姆的写作基金，搬回来写关于中国的一本书，同时带着我女儿在北京上小学。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也不想回美国去。所以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他们需要这个人住在中国；另外那个印度代表驻孟买，但是都要两边跑，因为总部在纽约。我正好借此也可以常去纽约，就答应了。

那时我对印度一无所知，极不了解。好在我们只是出资花钱的单位，在纽约筹办项目，在中国、印度、美国三地分别、分批选拔相应的学者来合作做研究课题，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开始真是两眼一抹黑，我的一些朋友也很纳闷，说你怎么搞到印度去了，印度有什么好研究的？

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七八年变化非常大：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印比较、中印美三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都变成了热门话题。我们的课题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好几期不同的成员，课题组有些人也变成了朋友，比如第一期里面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姚洋，（记者）郭宇宽，我们一起去印度考察，也成了朋友。后来的中国成员包括许志永、卢思骋、李波等。印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由此不仅对印度增加了一些了解，而且印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中印比较和中美比较很不一样。

Q: 具体怎么不一样？

A: 印度与中国同为古老的亚洲文明，互为邻居，可是我们彼此的研究兴趣相当弱、相当差。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印度是在我们意识之外的，至少是在边缘上，有很多出于无知的偏见，我们老是盯着西方，主要盯着美国、欧美，对吧？

我们对印度其实是很漠视的，他们对中国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本来他们在历史上觉得自己是中国的老师，因为佛教就是从他们那儿传来的嘛，在文明交流中，中国受惠于印度很多。然而 1962 年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是战败者，他们认为中国背叛了友谊，尼赫鲁为此郁郁而死，所以他们对中印有一种伤痛的情结，不信任、有敌意。

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市场改革起步晚一些，至今走在中国后面，与我们又有一种竞争心理。但他们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优越感。不只政治制度，在价值观、精神文明、意识形态上，他们好像都有一种优越感。你别看它有那么长的被殖民史，很多印度人在文化上相当自我，认为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最优秀。

去实地考察以后，发现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在这么一块与我们同样古老的亚洲文明土地上实行民主，实际运行的经验其实非常复杂，成败得失，一言难尽。它为什么跟欧美式民主不一样，英国人带去的民主、法治是怎样演变成了另一种样态的民主、法治？这当然与它的历史文化有关系。而印度可以作为中国追求民主的一面镜子。毕竟我们跟美国太不一样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地理文化决定论者，对地理文化是特别在意的，很多东西你得推到历史的源头上去看，不能光看现在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文明的主流是儒家传统，而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不是佛教呢？为什么我们历史上多数时期一直是王朝、帝国，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呢？有很多东西，都跟现在的问题直接相通、一脉相承，不看历史就看不清今天。去看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邻居，当然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

比如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很多印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是非常崇拜的，对中国革命持有非常浪漫化的观点，我认识的好多印度左派学者都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种性问题、不平等的问题。人们往往出于自己的问题，去从别人那儿取经或者抓别人的东西来，就像我们爱把西方的某些东西拿来批判我们自己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把西方浪漫化了。总之转了一圈，印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体，一个学习、借鉴和理解我们自己的镜子。这个工作让我获益匪浅。

【德商张大中】

英文名：A Good Tycoon

【导读】做事保守的张大中看上去似乎是被别人一脚踢出了他赖以成名的家电零售业。可是随后他的老对手黄光裕身陷囹圄，陈晓遭人唾弃，他的全身而退简直是一场胜利。但他更看重的胜利是为他的母亲讨回公道，在这件事情上他积极果决，毫无畏惧和妥协。他的母亲在疯狂的年代里敢于挑战偶像权威而惨死，母亲的惨剧和骨气影响了张大中的一生。

2008年12月，一个寒冷的傍晚，我与张大中在北京那间灯火通明、空间开阔的办公室相见。他当时坐在T型办公桌后面的黑色转椅上，身后是一只散发着迷幻气息的大鱼缸，里面游动着18条肥硕、漂亮的红鱼。张大中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起他最近在股市上的失利：“一开始我是挣钱的。刚进去买了些股票，一周之内就大赚了一笔，可是这让我很不舒服。太快了也太容易了！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又投了几笔，这回赔了，我感觉也舒服多了——我付学费了。我在股市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笑着说，“以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股票术语经常让我头疼，现在

已经都弄懂了。不过我不急。”

就在一年前（2007年），这种“不急不忙”的保守态度还颇遭中国媒体非议，不少人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张大中在59岁的年纪被赶出了中国家电销售业；要知道，他可曾是这一行业引领潮流的先锋人物。然而今天，中国股市暴跌，熊市已持续一年，国际金融危机乌云密布，经济陷入低迷——此时，张大中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稳健与审慎就显出另一种意味来了。

在北京，“张大中”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办的连锁公司“大中电器”曾是京城最大的家电销售中心。然而，2007年12月，张大中却做了一件让商界同仁大吃一惊的事，他将自己的62家店全数卖给了黄光裕——一时年38岁的国美电器老板，从而使国美一跃成为国内行业老大。由于此次并购引起了四家电器巨人的纷争，其间充满各种诡诈与背叛，自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最后，张大中获益不菲，国美以36亿元人民币现购大中电器，并继续沿用“大中电器”的名号。带着亿万现金离开家电业，张大中随即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大中投资公司，变身为风投资本家兼金融投资家。一些忠诚的老部下仍然追随着他。2008年，张大中上缴税款5.6亿人民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高的个人缴税额。根据新闻报道，他付的税款比当年整个青海省个人所得税总和还要多。

对手

然而，在商界，许多人把张大中卖掉大中电器的决定看做是他在商场的失利。普遍性的分析认为，因为张大中的年龄及其保守的北方人性格导致了他目光短浅，对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而年轻的广东商人黄光裕不但看到了国内企业联营、标准化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且精力充沛、胆大冒险，颇有弄潮之技。

张大中喜欢引用一句中国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儿。”他也爱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黄光裕的名言则简单直接：“商者无界。”而且他对此言身体力行。事实上，并购大中电器只是其急速扩张的一步而已。他正在打造一个企业帝国，从家用电器销售到房地产，从地区性到全国再到境外。至于那种递给张大中一袋黄金请他走路的大手笔处理方式（相当于让张大中拉着一把黄金降落伞落地），也是颇具黄光裕风格的标志性手法。在中国商业媒体中，黄光裕拥有着摇滚歌星一般喧嚣的名声：他出身卑微，家庭有天主教背景，喜欢金色领带，甚至在一个充满了白手起家故事的国度，他也是一个传奇。

黄光裕还被看做是一个神秘的商业奇才。专家们仔细地研究其商业策略，有时会用中国武术行话来描述这位年轻的大亨，似乎在观看一位不动声色的黑带大师的行动。对于黄光裕敢于冒险的性格和胆大妄为的决断，他们甚为推崇。他们注意到他与挥金如土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之间的联系、他在融资中表现出来的精明、他对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对他灵活地使用各种金融工具的能力大为惊讶（比如，黄光裕经常对多个公司进行重组，通过资产洗牌与重组和重注资本来抬高股票价格），却少有人对此完全明白。但他们对黄光裕了解得越少，似乎越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相比之下，张大中“亮点”不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白手起家、吃苦耐劳；一直保持低调，避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心，据说生活相当简朴。他的故事似乎一目了然。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后，2008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像其他人一样，张大中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新闻——黄光裕因操纵股市、洗钱和贿赂政府官员被捕入狱。和美国麦道夫（Madoff）丑闻引起的后续反应一样，这条消息不啻于在经济危机依然弥漫的黑暗天空响起一声不祥的霹雳。黄光裕毕竟是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在胡润2008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黄光裕以4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名列第一。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高居榜首。2007年，张大中以38亿元人民币资产仅排第269位。如今，经济低迷依旧，黄光裕却锒铛入狱。官方对此案的调查在秘密中进行，不免招来各种谣言。先前的图景陡然大变。

对二人的观感也立时出现明显的差异。人们对黄光裕的崇拜——或许其中本来也掺杂着嫉妒吧——很快变为谴责。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嘲讽讥刺，人们把他描述成一个卑鄙无耻之人。有人爆料说他早年不但赤贫（小时候他曾捡垃圾糊口），而且还是一个野气十足的小流氓；他和哥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经常参与手段残忍的巧取豪夺、贿赂、帮派斗殴及其他肮脏的交易，而且毫无忌惮和良心自责。回顾国美与大中电器的合并，人们如今开始对张大中惊人的好运与财富赞叹不已——想想看，要是现在出售大中电器会是什么情形！何等奇妙、完美的时机啊！多有智慧、多有先见之明！一年之内，中国股市市值缩水70%。而就在黄光裕被捕两周之前，张大中从国美电器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并购现款！一位朋友描述说，连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都在纷纷议论张大中的福报。他告诉我：“我坐在出租车里，收音机正好在播放黄光裕的新闻，司机说他们都为张大中感觉庆幸。”

对那位已沦为阶下囚的同行，张大中本人却绝无再踩上一脚的心思。像往常一样，在公开场合他对黄光裕事件未置一词。在私下交谈中，他对某些敏感猜测不以为然，至于媒体认为导致黄最终堕落的原因是他太贪得无厌、太爱玩金融，张大中对此似有同感，但他显然没有幸灾乐祸。他对我说：“黄光裕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我现在不想做任何定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对我有过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

张大中身材不高却很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如同一位书斋型学者，由于长年锻炼，身体健康，看上去容光焕发。60岁的年纪保养得很好，眼光犀利有神，步态迅捷沉稳，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夹杂几句俚语土话。他的穿着风格比较保守，但也不是那种严实得不透气的样式。最常见的打扮是商务便装：一件单色西装衬衫，一条深色长裤，一双质地精良的皮鞋；天冷时再加一件蓝色或灰色毛衣。他既谦和友善，又机警谨慎。在群体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尽量不引人注目，是一个习惯于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的人。这位亿万富翁从无志得意满之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功与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并不比外面那些人聪明多少。”他说。那天晚上，我和张大中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坐交谈，他不时地抽烟、喝茶，谈兴颇高。他对我描述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奔驰轿车的情形。那是1970年代末，北京举办了一届德国制造产品展览会，张大中赶去观看。当时他在北京郊区一家村办供销社卖猪肉，月工资30元人民币。工作近10年后，除了一辆自行车，他一无所有：没房子、没存款、没女朋友。展览会上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辆奔驰。他回忆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久好久，心想，这辆车可真是太漂亮了！当然，我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开上自己的奔驰。”如今，张大中有两辆奔驰。他说：“如果中国没进行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人，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如果你要写我的故事，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想想30年前我在哪里，这条路就像是地狱到天堂。”

起点

这条路始于 1979 年。那年张大中决定做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比拥有一辆奔驰汽车更没谱儿的“大事”——他希望中国政府改变对他母亲王佩英的判决。

王佩英，一位普通的幼儿园阿姨，曾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公开批评毛泽东。虽遭拘押、批斗，她仍拒绝放弃自己的看法，因此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长达两年半的“药物治疗”。后来她被单位带回，送进专门关押“反革命”的“牛棚”。在参加强制劳动的同时，她时常受到讯问、殴打和羞辱，顽强不屈的态度为她赢得了“罪大恶极”的称号。1970 年 1 月 27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10 万人批斗大会，她与另外 16 个“反革命分子”一道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她仍不屈不挠，坚决反抗，行刑者便在车上把她用绳子勒死。

王佩英的丈夫是铁道部一位中层干部，他们生了 7 个孩子，前面 6 个都是男孩，最后 1 个是女孩。张大中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因肝衰竭去世时，大中只有 12 岁，是母亲王佩英一个人抚养他们。因为生计艰难，他们不得不打发跟从张家多年的保姆回老家，因为实在担负不起她的费用了。张大中还记得心爱的阿姨离开的那天，他如何站在阳台上默默流泪。他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这些衣服永远是补丁摺补丁。夏季，张家每个孩子都只有一条裤子，每天晚上都得洗，这样第二天早晨才能穿上干爽的长裤。为了维持生计，王佩英不得不定期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其中包括从她父母那里传下来的古董和丈夫留下的旧冬衣。但这还不是最穷的时候。到王佩英开始公开批评毛泽东，他们一家马上变成了“黑五类”家庭。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张大中仍然不免情绪起伏。他每周一次去精神病院探望，眼见母亲在药物作用下面容苍白、昏沉虚弱，却仍然坚定不移。此案给所有孩子的生活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有这样一位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做母亲，张家被盖上了耻辱的烙印，子女们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无法上大学；他们的婚姻前景也非常黯淡，因为大多数人都希望与这样的家庭联姻。张家子女们接受了这种命运，好几个人都搬到外地定居，在那里从事单调枯燥的工作，放弃了迁回北京的希望。

当时张大中也觉得自己只能滞留在乡村供销社工作糊口了。他告诉我：“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压抑，我看不到任何方向。”他不想无所事事，就买了大量旧书阅读。一天，书里的一句话让他深受震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他说：“我记不得它是出自哪篇文章、哪个作者了，但这句话突然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我决定从此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已经在生活的谷底了，那就接受它吧！”他每天清晨 6 点起床，沿着乡村小路跑 10 公里，甚至大冬天也穿着短裤跑步。“跑完步我一整天精神都很振奋，总是兴高采烈快快乐乐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家庭，我就告诉他们：我爸爸是一位共产党干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邓小平复出，开始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解冻初期，人们仍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唯有张大中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的真正含义。他给邓小平及共产党其他高层官员写信，请求重新审议对他母亲的判决：“这事我没告诉两个哥哥，他们会认为我在给组织添麻烦！”为了赢得同情，他在信中讲述了父母早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当时，那是非法的，属于地下工作；他也指出母亲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批评毛泽东的。几个月后，终于有一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要他到半步桥监狱办事处去一趟。他去了，工作人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然后让他回家等着。三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开始继续写信发信。“每周我都给所有部门邮寄一批信件。当时冤假错案太多了，许多人都在寻求解决，我知道唯有坚持不懈，才可能获得机会。”

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0年1月，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对王佩英的判决：她不再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她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发表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虽然这只是对判决书的有限修改，却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月后，张家的7个儿女领到了政府提供的补偿金——7000元人民币。

拿到分给自己的1000元钱时，张大中心情沉重。他告诉我：“虽然我还并不完全理解我母亲，但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一笔血钱。我不想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样用这笔钱买电视机或家具，我觉得我必须拿这笔钱做点儿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事业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鞭策着我向前走。”

起家

最终，他把这笔钱一分两半。当时，他刚刚经朋友介绍有了一位女朋友，决定结婚时，他花了500元钱来置办婚礼和做蜜月旅行。“我把剩下的500元钱存起来，准备做事业的启动资金。”

一年后，张大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尝试。他买了烧碱、清漆、银粉、刷子和抹布，把它们通通放进一只旧军绿书包里；星期天跑到大街上，举着一块牌子，上写：“刷煤气灶，8毛钱一个”。他穿得干干净净，是一个看起来让人很有好感的年轻人，人们打开门让他进入自家厨房。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天，干了一整天之后，他算了一笔账：他给10只煤气灶进行清洗和刷漆，总计收费8元，抛除工具费用，他净赚了2元钱，但这还不算劳力付出。张大中笑着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这份买卖。”

他的下一个商业活动是制作灯具。他把自家厨房改造成工作间，从不同地方弄来一套工具——饼铛、纺纱厂的梭子、电线和灯泡——用它们拼装制作了几盏落地灯。他把这些作品送到当地农贸市场出售，每盏灯售价6元，竟然真有买主，让他喜出望外。甚至还有两家百货商店向他订货；当时百货商店里产品稀缺，连这类粗糙的手工制品都缺货。在家里兄弟们的帮助下，张大中制作了60盏同一款式的落地灯，并全部售出，净赚160元。这让他信心大增——他作为企业家的潜力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不过，制作落地灯的活动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张大中意识到，这种低廉的手工制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太有限了。在寻找其他商业机会的过程中，他听说一位朋友所在的研究所里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件。张大中向来擅长动手摆弄制作各种东西，在闲散无聊的那些年，他经常帮朋友们打家具、组装晶体管收音机。于是，他想到用这些电子元件组装音响放大器。他以低价买回一批电子元件，在家里的餐桌上组装了一台音响放大器，然后把它送到一家商店。得到积极反馈后，他随即购置了更多的元件组装更多的放大器。这一次，他一举成功：仅仅一个月，商店就卖出了100台放大器，而这是张大中用一个月的时间组装制作的。订单蜂拥而至，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快张大中就无法只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事了。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1982年12月，不顾亲友们关于千万不能丢掉“铁饭碗”的劝诫，他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在辞职信中，他写道：“我决定辞职，因为这份工作不符合我的理

想。”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 41.5 元人民币。

终于获得自由之后，张大中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张记电器加工铺。当时他和妻子住在一间 30 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他再次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工作间，把床搬进厨房，把厨房挪到走廊。他雇佣了几个工人进行培训，并给他们发计件工资。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城郊乡村的年轻农民，非常高兴能在城里找到一份每月七八十元钱的工作，所以干活非常卖力。张大中自己则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他监管所有环节，骑着自行车满城去购买质优价廉的元件和模具，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专业音响杂志。他非常快乐，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到 1983 年底，北京有 50 多家商店销售张大中的音响放大器。他月收入达到 2000 元，在随后的 4 年里，这个数字又翻了 3 倍。

为了拓宽业务，张大中开始进入音箱的制作与安装领域。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仓库，租金很便宜，2000 多平方米的场地做制造车间也很适合，只是周围的环境不太理想——车间隔壁就是养猪场。每次客户来提货，车后都跟着成群的苍蝇。

张大中很及时地看到，在北京，制造业远不如销售行业的前景好，利润率低而且资金周转期长。他决定集中精力销售电子零部件和小商品。1986 年，他在位于市区中心的灵境胡同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店铺面积狭窄，但因为卖的都是像袖珍计算器这样的热销产品，所以仍然生意红火。张大中从广东低价购入袖珍计算器，然后以 8.8 元卖出，有许多顾客排队购买。不久，他在银行的存款就达到了 5 万元左右。1980 年代，国人把他这样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称作“万元户”。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标准，这种称呼就像把某人叫做“百万富翁”一样。张大中似乎在转瞬间就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1986 年年底的一天，市工商局打来一个电话，让张大中去那儿“坐一坐”。他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工商局有权关闭任何商家。果不其然，他被告知“违反规定”——在同一个人的名下开办了两家店铺。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个体户无权开办分公司，因为“连锁”这个词听上去太有“资本主义”的味道了。道歉之后，张大中马上关闭了那家惹麻烦的商店。

幸运的是，一年后，国家的政策就发生了改变，允许建立分公司。张大中说：“你无法想像，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多么百感交集。”

他立刻开始扩大经营。1990 年代初，卡拉 OK 流行于中国的大小城市，尤其受到商人和新富们的喜爱。张大中趁此机会用火车从南方运了整整几个集装箱的卡拉 OK 机，结果销量火爆，利润丰厚。到 1993 年，他已经有了 100 位员工，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万元。但他并未因此满足，而是准备再做些新的事情。在考察市场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北京所有音响店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不过十几平方米，很少有超过 100 平米的，没有一家商店能够满足顾客的所有需要。一个新的想法在他的脑中形成：人们会欢迎一个能够找到所有品牌、所有零配件的大商场出现，这样的购物会更容易也更方便！

这个想法让张大中激动，他决定“做大”。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他选定了店址——北京西边玉泉路上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他租了一个 4000 平方米的场地，架子上摆满了所有能找到的国内和国际品牌的音响。他把这家店命名为“大中电器”，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启用。这是

一次飞跃，也是一场冒险。不过，残酷的打击很快降临。1993年7月，玉泉路店开张之后，顾客稀少，冷冷清清。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营业额始终停滞不前。这家灯火辉煌、产品丰富的商场静悄悄地开着门，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意；每天的现金流水连支付雇员和水电的开销都不够。这是张大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低谷。他一连几个星期都焦虑得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他甚至考虑过关掉这家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大中笑着说：“如果到了赔不起的时候，我就打算认栽了，撤回市中心，继续开小铺。不过，一想到那些开小铺的小老板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丢不起这个脸，这比赔钱还难受！”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通过广告和顾客的口口相传，玉泉路大中电器的名声逐渐传开了。半年之后，营业额开始增加。作为中国第一家音响器材大卖场，玉泉路店开始为人熟知。张大中随即扩大了租用面积，增加了更丰富的产品。除了继续经营音响产品外，商场很快开始销售电视机、空调、冰箱等等。新模式取得了成功。张大中和他的团队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营销经验：他们的广告、促销活动和展台都变得更有创意和亲民。玉泉路商场以其一步到位的购物方式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起种类繁多、质量可靠、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好名声。在几年的时间里，商场的面积就扩展为一万多平方米，产品种类多达两万余种。张大中很满意自己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卖音响零配件的“小老板”了。

升级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其重要性。如今，张大中已经拥有了良好的“配方”、品牌名称、丰厚的资本和经验丰富的团队。他已经具备开办连锁店的能力，他也打算这么做。他的公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北京地区开办了6家大中电器；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家，占领北京市场50%的份额。2004年，分店的数量上升为68家，不仅占据了整个北京市区，而且还延至周边所有县城和3座邻近的城市。其中最大一家商场于2002年在三环路中央电视台塔旁边开业，店面占据了一座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楼房，旁边还有同样巨大的户外停车场。自2004年以来，这家商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迄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赚钱的家用电器店。到2005年年底，大中电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是北京地区的行业领头羊。张大中因其良好的纳税记录和在顾客、员工中获得的美誉被公认为一位模范企业家。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在多个官方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变局

也许张大中过于将精力投入在自家公司的迅速拓展上，而忽略了别处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当他埋头在北京市场上深耕细作时，另外三家连锁公司——上海的永乐、南京的苏宁和北京的国美——也都在迅猛扩张。每家公司都在当地确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寻找新的市场，迅速形成跨区域连锁店。引领这个潮流的是国美老板黄光裕。

黄光裕来自于广东省东南沿海汕头附近一个种植水稻的小村子，起初在内蒙古做生意，年仅18岁就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店。1999年，他把北京当地的各个店铺合并成国美电器连锁店后，开始在其他城市开设分店。苏宁和永乐也紧随其后开始类似的扩张。当时，这三家连锁公司的国内市场份额并不高——2000年时三家总共才占3%。不过，这场竞争很快进入白热化。不久，三家公司就在所有主要城市打起价格战，在对方的地界开店，到处推进开辟疆域，一路上“摧毁”了不少小商家。在5年的时间里，三家公司的总计市场份额上升为13%。到2005年，三家公司都在香港或深圳成功上市。在三家中，国美的步伐最快，400家连锁店的年销售额为400亿元；苏宁位居第二，将近3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370亿元；永乐的

规模是国美的一半，200 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 200 亿元。而被零售商们称作“价格杀手”的黄光裕此时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拥有更多可操纵的资金，因为他已经进军房地产，成为其中的大玩家。

大中电器则排在第四位。随着三位巨人日益逼近的脚步，危险慢慢地环绕在张大中的周围。当他们争先在新地界插上红旗的时候，张大中却在紧缩战线以巩固他在京城市场的主导地位。也许因为大中电器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来自北京地区，所以他在其他城市开设的几家连锁店做得并不太好。因此，直到 2005 年，他才不得不面对“不做大，毋宁死”的业界格言，开始谨慎地策划走向全国的方案。他派出十几个团队奔赴各省考察，然而调查结果向他展现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图景：尽管大中电器在北京仍稳居领头羊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与另三位巨人比起来，它却相形见绌，其他市场都已经被三家占领了。张大中心情沉重地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

回首最终卖出大中电器的决定，胡凯的事情似乎可算作一个早期的信号。胡凯是胡蓉的弟弟，胡蓉是张大中的高中同学。像张大中的家庭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胡家也沦落到了社会底层，分别是工程师和教授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胡凯在外省做过一系列没什么前途的工作，1980 年代回到北京，既无学历也无职业前景。胡蓉跑到张大中的办公室，请求他给自己的弟弟一个机会。张大中聘用了胡凯，一开始让他做采购员。胡凯工作非常努力，很快就展现了他的才能。张大中对他精心培养，一步一步地提拔他。胡凯先后做过办公室主任、部门负责人，最终成为公司总经理。大中电器进入快速拓展阶段，胡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胡凯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谈判高手，同时也是一个谨慎精明的管理者，他可以谈判成交、装修新房子、开一家新店——所有这一切在一周之内完成。张大中对他完全信任。2004 年的一天，在完成三轮谈判之后，胡凯感觉胸口有点儿闷，不太舒服，就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他心脏病突发而死，年仅 53 岁。

胡凯的去世对张大中打击巨大。他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告诉我：“我们两个合作得非常默契。每天早上我们只需交流一两句话，然后我就可以把日常运营交给他，完全不必有任何担心。那种感觉真是畅快。”胡凯去世后，张大中只好独自监管一切。此时他已经在商界奋战了二十多年，他的公司拥有两万员工，企业的规模迫切地要求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吸纳新生力量。然而，中国许多私营企业自身存在的某些已然僵化的文化习惯很难轻易改变。大中电器公司一些资深管理人员告诉我，公司的运转一向是根据张大中的商业直觉和想法做决定的，也就是说，大老板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但这种情况 2002 年以来出现了变化：就像坐上一列快速列车之后，在加速当中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既未准备好、人手也不足。决策程序过于草率和随性，缺乏制约和平衡机制；公司到了迫切需要吸纳更多职业经理人的阶段。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大中此时则进入了事业的疲惫期。连续多少年，他每周的工作只包括这几项内容：周一至周三，商谈订单；周四，讨论广告；周五，鼓舞员工士气；周六，听取销售报告和财务报表。他承认：“一年又一年，都是同样的程序，我感觉疲倦不堪。”

退出

胡凯的猝然离世使他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自己的年岁。张大中对我说：“人们都说他是过劳死。”而他自己也不再年轻了。对下一阶段的白热化竞争，他准备好了吗？对于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一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公司大权交给儿子。但张大中的独子对商业管理毫无兴

趣。张大中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又派他到自己名下的一家店里去工作，从卸货、装货上架的工作干起。张大中告诉我：“但他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对金钱也毫无欲望。”张大中的妻子楼红光身材瘦削、举止文雅、眼神羞怯，曾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平面设计师，后来在丈夫的说服下在公司做财务。在发现一名员工盗用货款之后，张大中希望能有一位家族成员负责账目和税务。但楼红光是一个比较内敛羞涩的人，对商务没有什么兴趣。她带着抱歉的神情对我说：“我想儿子的性格比较随我。”（楼红光拥有公司小部分股权，但已不再工作。目前，她做居家太太，与朋友们玩牌打发时光。）

张大中曾一度打算通过招聘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他所谓的“中国一流的商业团队”。但这需要时间。而事情的发展过于迅猛，按照张大中一向审慎的方式来进行此事已经来不及了。一不留意，国美和苏宁就兀然出现在邻近的地界。沿着三环路，彼此相距不过大约 500 米的位置，三家零售连锁店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看着你。

2006 年 4 月，传出一个重大新闻——永乐和大中对外宣布他们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合并。根据四家连锁店的名称，有人玩起了文字游戏，新闻记者兴奋地宣称“乐中”（分别取“永乐”与“大中”名称中的一字）联盟将与“美苏”霸权（分别取“国美”与“苏宁”名称中的一字）形成三足鼎立的对抗。这种表达并没完全说错，不过，在两家公司完成并购程序后，张大中在新的永乐—大中公司中属于少数股东。根据张大中和永乐公司创办人陈晓之间的协议，永乐在一年时间里获得购买大中电器公司股票的优先权，其价格会依据那一年大中电器的销售业绩、运用一套公式来计算。为了表明联合的诚意，陈晓预付了张大中 1.5 亿元保证金；而张大中则同意，如果他毁约将赔偿陈晓两倍的数额。这基本上是一个君子协议，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合并的前景进行着。张大中只需要确定一件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保持其商场的销售额。他知道这件事他能完成；毕竟，在北京地区，他名下的商场仍然占据着 40% 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国美和苏宁加起来的份额。

然而，他却没料到，国美此时正觊觎着上海市场，黄光裕也在寻求与陈晓的合作。三个月后，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永乐同意被国美并购！这意味着，不但“乐中”的联盟迅速瓦解，而且同时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美”和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苏”。大中电器则被排挤出局。

张大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将慷慨大度地对待此事。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给陈晓一条公开信息，基本上等于只有两个词——“祝贺！再见！”他准备返还陈晓的 1.5 亿保证金，取消先前的协议。出乎他的意料，陈晓竟然说“不行”！他让张大中留下保证金，因为他们的协议仍然有效，大中电器既然从法律上已经与永乐联合，现在它也是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国美大家庭的一员了！

此举大大地激怒了张大中。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解释说：“谁都知道，好女不嫁二夫。这就像我和某人订婚了，但他背叛了我，和别人结婚了，还非要把我当嫁妆一块儿带过去！”这种做法等于双重侮辱，完全不可接受。张大中宣布，他立刻单方面解除大中—永乐联盟，而且会保留那笔保证金。陈晓也随即宣布说，鉴于张大中单方面终止了协议，他需要承担 3 亿元的违约金。在此后的一年半里，双方的争吵逐步升级，演变一场凶险的官司，事情由于新角色的不断登场而变得越发复杂。一波三折与有声有色的小道传闻，让记者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撒欢儿的新闻热点。张大中低着头，一言不发，婉拒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对某些人来

说，他已经成了被同情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跑在最后的好好先生，在即将到来的混战中注定会被碾压在地。只有待最终尘埃落定，人们回首往事之时才会发现，在他的家电销售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中，张大中的动作其实如同一位扑克高手，不动声色地连续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好牌。

刘歌是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兼资深合伙人。2006年9月的一天，他刚做完一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后，坐在丽都大酒店的大厅里喝着咖啡，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那边传来的是张大中的声音，他非常惊讶。他们只见过一面，大约5年前，当时刘的妻子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曾经介绍一位摩托罗拉代理人与张大中相识。刘歌给张大中留了一张名片，但从此再未与他有过联系。在电话里，张大中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备对永乐公司的诉讼材料，要递送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希望解决这场纠纷。刘歌是否能抽时间看看他的律师起草的诉讼文件呢？后来，刘歌发现，在给他打电话之前，张大中已经“搜”遍全城，找过一批律师了。

君合律师事务所是一家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有200多名律师，办公室在华润大厦里占据了整整两层楼。华润大厦赫然耸立在建国门桥边，人们认为它很像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君合（此名源于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的创办人和几乎所有合伙人的事业路径都很相似：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而后到美国的法学院深造或获得一个学位，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之后，回到中国，加入君合。刘歌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刘歌身材魁梧，身高1.85米，穿一套笔挺合身的西装、配着无可挑剔的领带。他当年是北大排球队队长，在芝加哥律师事务所工作了7年，喜欢打高尔夫。每当他需要从自己在华润大厦那间带有两面落地窗的拐角办公室走出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他会从20层乘电梯去到位于28层的美洲俱乐部，那里的长排落地窗视野更为开阔，可以鸟瞰北京城壮观的全景。像君合许多同事一样，刘歌经常带客户和朋友到这里用餐；他也喜欢在这儿吸上一支雪茄放松自己。

纠纷

刘歌答应可以看看材料。他说：“我告诉大中，如果材料看起来没问题，他还是应该找那位律师，因为我们收费非常高。不过，我看完材料后，不得不告诉他，效果不太好。全部的论证都是建立在一个论点上一对手没有公平办事。这种案件只靠道德论证是不可能打赢的。”几天后，张大中带着一张5万元钱的支票参加了在君合召开的咨询会，聆听刘歌向他提出的论证思路与对策。刘歌告诉我：“一切都是严格地建立在法律规定及其阐释的基础上。”他随口说出一串法律术语和合同条款，并继续说，“不过，我采取的核心观念是一位美国人提出的一种相当新的公司理论。这种理论揭示出某些公司是如何利用其企业地位逃避履行相应的责任，并指出应如何在法庭上揭露这种情况。”刘歌将这套美国公司理论做了某些本土化处理，甚至用一些中国政治术语进行了详细解释。张大中辞退其他律师，正式聘请了刘歌。在一起分析案件时，他们推断出，此事背后自始至终有黄光裕的身影，早在永乐一大中达成协议之前，他就在玩着一箭双雕的把戏。他们不想让他得逞。

陈晓也请了一位有在美国法律界工作背景的律师。像黄光裕一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面，陈晓并非新手。在黄光裕听从高盛投资公司的建议，开始与贝尔斯登公司建立投资基金之时，陈晓则有J.P.摩根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作为其投资人——两家公司都购买了永乐的股票。现在有了刘歌的加入，张大中知道自己找到了他们的对手。诉讼持续了15个月，仲裁委员会

关于这起案件前后开庭三次。经过一年多的法庭激辩，双方都不肯让步，也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张大中还曾亲自与刘歌一起出过一次庭，当时陈晓也与己方的律师坐在对面。张大中后来告诉我：“他坐在那儿，听我说完后，无言以对。”随着时间的过去，张大中和刘歌对胜利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很久以后，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张大中才谈起当初他为什么要把大中电器全盘卖出。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对于大中电器的连锁店来说，此时走向全国，有点儿晚了；而且他认为，中国零售业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他告诉我：“我认为拓展的空间正在变得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家都已经买了电视机和音响；家庭购买和配置的第一次浪潮已经结束。随后的电器更新周期会比较缓慢。我不想等企业走到一个紧急时期再卖出。”有了与永乐交往的经历后，出售企业、拿着期权股票、以小股东身份继续留在这个前景暗淡的行业，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吸引他了。他希望干净利索地离开这个行业，然后手持大量资金去做些新的事。“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实业，到了该换换的时候了。”于是，套现成为张大中的唯一目标。最关键的当然是如何才能拿到一大把现金。

尽管看起来他似乎身处陷阱和重重危险之境，但张大中对自己的优势有充分的认识。正如刘歌所言，他是“京城的一块肥肉，人人都垂涎欲滴”。或者如新闻标题所言——《得大中者得北京》。此时，大中电器是中国唯一一家未上市的大型零售连锁店。在他考虑向全国扩展时，这曾经被当作弱点，此时却成了这家公司最吸引买家的地方。国美和苏宁表面上都装作很漠然，但张大中知道他们对此都有十足的兴趣。其他的买家也纷纷浮出水面。百思买正在寻找进入中国的途径，他们开始接近张大中。通过刘歌的介绍，英国一家重要的零售连锁店也参与到谈判当中来。张大中发出消息说他正在寻找买家，但对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守口如瓶。

终于，2007年4月，苏宁和大中承认他们正在就“发展与合作”进行交流。一时间谣言满天飞。5月，从大中公司传出一个“泄密”的消息，透露说苏宁提出了一个30亿元的收购价位。尽管还不确定，这消息一定让黄光裕夜不能眠。

国美的最大竞争对手苏宁也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感谢A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热度”，苏宁的市值刚刚超过国美，公司便宣称其股票“是中国电器连锁企业中最好的首次公开募股”。一个记者写道，如果苏宁此时收购了大中，它就可能像“在国美的核心——北京地区刺了一刀”；这将使黄光裕难以容忍。而且，由于法庭诉讼正在向不利于他的方向演进，黄光裕利用永乐“诱捕”大中并以此阻挡其他潜在买家的企图也正在落空。

接着出现了“间谍门”事件。大中电器公司的一位雇员给国美提供了公司有关销售的绝密信息之后逃走。有消息说，这个“内鬼”是国美事先安插的。这事发生在2007年5月下旬，大中的管理层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说要宣布一个“轰动性新闻”，并将对当事人提起诉讼。北京所有的商业媒体悉数到场，在一块写着“惩戒不法，诚信为商”八个大字的布告牌前等待新闻发布会开始。足足晚了30分钟之后，大中的一位公关部主任才出来宣布取消此次发布会。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之下，这位主任透露说：基于张大中和黄光裕之间的一次私人沟通，张大中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新闻发布会，也不再追究那个“内鬼”了。那么张大中和黄光裕究竟谈了什么呢？这个“间谍门”是不是张用来与黄周旋打出来的一张牌呢？这段插曲为这段故事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不过说到底，张大中手里最大的一张牌还是公司的销售业绩。随着经济的振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器产品成为畅销品。2007年10月第一周正是国庆黄金周，也是疯狂购物周，大中电器商场里人满为患，销售人员24小时轮流工作。国美和苏宁商场也一样。不过，一周结束，大中62家连锁店销售总额超过了国美、苏宁在北京地区80家店面销售总额10%以上。单单10月1日这一天，大中商场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3.5亿元人民币。黄光裕和苏宁的老板都分别给张大中致电祝贺。两家公司公开地向张大中示好，这是一场看谁出价更高、出手更快的较量。

12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当苏宁出价30亿、已经接近拿下大中之时，黄光裕的活动也更加急迫。张大中告诉我：“他那时每天都派人来观察我们。他们日夜在我的办公大楼周围转悠，想看看是否有苏宁的人已经搬进来了。”最后，张大中向黄光裕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我告诉他，如果他同意付36亿元现金，再加上赔偿永乐破坏协议的两千万元现金，那就可以成交。否则，我会卖给苏宁。”两天后，黄光裕答应了所有条件。第二天，苏宁撤出竞争。12月14日，国美宣布并购大中。几周后，仲裁会给出判决：大中打赢了这场官司；永乐因破坏协议，需付给大中两千万元赔偿金。

黄光裕付了这笔钱。但6个月之后，张大中又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他解释说：“陈晓这事做得不道德，所以我要告他；但这从来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想讨个公道。”

母亲

母亲王佩英的事则是张大中要讨的另一个公道。卖掉电器商场后，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不时地就会想起母亲。他常常沉浸在对她一生意义的思考中。他发现，她其实是他做所有事情的动力。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教给他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人要有骨气。”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中。她用生命为儿子树立了一个鲜明强烈的榜样。在一个毛泽东被当作神来崇拜、以绝对权力统领国家的时代，她的勇气从何而来，竟敢公开向毛挑战？如果说，在1980年，唯一能够洗掉母亲头上“反革命分子”污点的办法就是将她描绘成一个“精神病人”，那么现在，张大中感到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对我说：“这玷污了她的形象。她没疯，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疯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想要还原真相。”

为此，他聘请了一位律师帮他准备再次上诉、申请平反的文案。他自己则着手从法院、公安局、工作单位、老邻居和家族亲友那里搜集所有与母亲相关的信息资料。每次我到他的办公室，或者与他在电话上交谈，他都会热情地向我展示一些刚刚拿到的材料，或者讲述他刚刚发现的某个细节。我第一次采访他时，六个小时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谈母亲。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王佩英1950年代的照片，是一帧放大的黑白照。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穿着一件样式简单的黑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纱巾，姿态优雅，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忧郁。张大中一再对我说：“她在世的时候，我太小了，根本无法理解她；但现在我尝试着去理解她。”他反复对我表示，希望我主要讲述他母亲的故事，而非他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多大不同，我母亲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讲述。人们应该知道、应该记住像她那样的人。”我问他，此事是不是他心底最深的一道伤。办公室里忽然一片沉寂，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随后，他迅速点了点头，又伸手拿过一支烟，点燃吸起来。有一次，在美国旅游，他看见大街上矗立着一尊铜像，塑造的是一位青年英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景象：他浑身被绳子捆锁、备受折磨。张大中顿时热泪盈眶，雕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对我说：“我准备请一位艺术家帮我为母亲做一尊雕像。”

然而，不久前，他承认自己遇到了“软钉子”。没人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拒绝他，但当局在与他及律师接触的过程中，却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申诉悬置起来。他总结说，政府仍未准备好重新公开并正视这段历史。“他们担心会有太多的家庭提出同样的要求。”他告诉我另一起相似的案件：一位上海音乐家刘文中在“文革”中因批评毛泽东被处决。“他被‘平反’时，他们也说他当时得了精神病。”2010年4月，张大中与北京高院的领导就母亲的案件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分手前，这位官员问他：“大中，告诉我，你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

显然，无论张大中的个人愿望如何，对于政治行动他的态度非常审慎，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手段。他对我说：“首先，我对现任领导人没有任何不满；第二，我其实非常理解他们不愿马上解决这些案件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革能走多快？太快也未必就好。假如我们现在实行像印度那样的民主，可能就没有稳定和高效了。总体而言，我对目前的改革步伐还是相当满意的。”

张大中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激进变革，这自然缘于他个人的审慎性格，但也折射了中国精英阶层逐渐形成的共识。这种看法既是基于八十年代之后清醒的现实感，同时也要归功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满意度和过去20年里个人自由的大大增加。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正视自己现代史的阴暗面，这个民族需要民主化，但没有多少人指望它能很快实现。如果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政治上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中国商人则更有谨慎小心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更多地需要依赖政策和政府的善意。

吴晓波是研究中国企业家历史的知名专家，就此题目著述颇多。在近作中，他描述了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从王朝时期到当代一直存在的复杂而危险的关系。在吴看来，中国商人无论多么富有和成功，面对国家政权始终都是如履薄冰，而后者有着剥削与控制商人的悠久历史。吴说：“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中国企业家都是爱国者，他们热切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有时候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许多企业家表现出比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更理性、更现实的理想。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反而经常要面对政府的敌视和公众的偏见。”不过，吴晓波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或许正因如此，我感到张大中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张大中的“发小”冷铁松曾给我讲了一个张大中如何受到北京市工商局官员“要挟”的事。按照冷的说法，那位官员处罚了一个商人，没收了一批建筑材料，然后强迫张大中把它们买下来。“这些材料对大中电器公司来说毫无用处，就是一堆废品，但大中还是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冷总结说，“在中国当一个私营企业家并不容易。”可我向张大中问起此事时，他却笑着说冷其实并不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和工商局那些官员相处得非常好。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圆滑，但人际关系就是有来有往。没有谁强迫过我。他问我想不想低价买下那些建材，我说行啊，因为我仓库里有地方存放，而且备着这些东西有需要的时候用起来也方便。”张大中承认80年代的时候，政府和全社会对个体户还不大看得起。“但1992年之后情况就变了，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有了改善。从整体上来说，政府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德商

李少华是一家提供房地产管理服务的私营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他和张大中一样，认为政

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了良性的改进。1993年，李少华和张大中在一次业务会议上结识，后来逐渐成为好友。两人都在北京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当过几任副会长。个协是一个帮助协调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组织。90年代初刚创办时，个协只有十几位成员，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位。“1995年，因为我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大中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应邀参加工商局会议的。政府通常比较支持做实业的好人、老实人，而不太喜欢做期货、炒房地产、手里拿着最时髦手机的那种人。”

最初，李认为张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相貌平平、工作勤勉但在会上很少发言的人”。“以前我每次去大中公司拜访，都看见他身穿一件蓝马甲工作服，看起来就像个打工仔。他甚至很少喝好茶，更别提名酒了。”李少华笑着说张大中近来开始对红酒和茶发生兴趣了：“他在会上现在爱讲话了，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多年交往下来，李少华对张大中越来越心生敬意。“我认识很多富豪，坦白讲，其中很多人实在不是东西，作为人都让你恶心。”他神情阴沉地向上翻翻眼睛，“我在这儿就不指名道姓了吧。但大中是一个少有的好人。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往往称一位有学问有文化的商人叫儒商，我想大中应该叫‘德商’。”他接着列举他这位朋友的诸多美德：正派、诚实、韧性、冷静、自信、坚持原则，既不见风使舵，又勇于挑战自我。李少华认为，这些个人品格使张大中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而他之所以深受朋友和员工们的爱戴，则是因为他的敏感重情和慷慨大方。“有一次他听他的司机说起我的司机要结婚了，马上送了一个红包给我的司机！还有一次，我临时取消了他的会面，因为我岳父去世了。随后，在火葬厂，我们惊讶地看见了大中和妻子，他们匆忙赶过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表达一下慰问。我的妻子深受感动。”李少华说他终于发现了张大中和他认识的其他富人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怎么赚钱，大中却是一个真正知道怎么花钱的人。难怪他会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有这么多人衷心爱戴他，我认为他现在就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

确实，我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提到过张大中的慷慨大方和感恩重情。张大中以前的同学胡蓉用一句中国古话描述张大中的为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仔细寻找过那些在张家饱受磨难与贫困的岁月里，曾经向他们表示过哪怕只是一点善意的人。比如一位老邻居，她曾经说过几句鼓励他的话，或者有人请他到家里吃过一顿简单的饭，或者是一位借给过他5毛线的同学？他满怀感激，对他们慷慨回报。为了感谢那些在他刚刚起步时帮助过他的人，他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以6万元回收一盏二十多年前他亲手制作、售价为6元的落地灯。一位顾客回应了这则广告。现在这盏他花了6万元买回来的落地灯就站在他办公室的一角。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乘出租车时听司机不满地说，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是腐败的恶棍，他们都是从给当官的拍马屁开始起步的。他指指那盏落地灯说：“嗯，我是这么起步的。”

张大中的不少老同学都已退休，如今都在靠养老金过日子。他们非常感谢张大中每年都张罗操办同学聚会，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胡蓉告诉我：“他穷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聚会，所有的饭菜都是他和妻子亲手做的。他富起来以后，就在饭店招待大家，同学聚会越办越好，成了大家每年都期待的活动。”2008年，张大中还出钱资助一群老同学到日本参观游览了一次，他不但支付全程费用，而且还代付了礼品费。他帮助不少老同学的子女在大中公司安置了工作；如果没有合适的职位，他会用钱帮助他们。

张大中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板。他与国美刚刚达成协议，马上就给所有员工分发红包共同庆祝。国美接管公司后不久，他设立了一项基金，专门提供给大中公司所有前员工。为表彰

这些员工对大中公司曾经的贡献，他们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小笔补贴。洪春（音）是大中电器空调销售部的经理，如今在国美工作，却仍可每年从大中基金中获得 600 元补贴。他告诉我：“我们都很怀旧。”他说，国美和大中的公司文化不一样。国美的管理是标准化和程序化的，这体现在其 ERP 会计制度和频繁的职工会议、备忘录和各种规章制度上。这更利于记账和全面管控。但大中的管理方式则更具人性化，更像一个大家庭。与洪春从未见过的黄光裕不同，张大中经常会定期去商场，他喜欢穿着和员工一样的蓝色工装，四处转转，直接感受一下销售现场的情况。一次，他看见一个销售员与某个犹豫不决的顾客不断地交谈，却无果，他便亲自上阵，提议说：“如果您买下这套产品，我可以给您 200 元的折扣。”那位顾客马上就掏钱购买了。洪说：“那些销售员听说这件事后，每个人都开始效仿老板。”

张大中会在午餐时间和销售部的员工坐在一起吃盒饭，和他们说说笑笑。许多大中的员工都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老板的架子，特别有人情味。”随着黄光裕入狱，国美的股票价值与先前相比缩水了 1/4；2009 年，销售萎缩。洪说员工的士气大为低落。“我还做自己的工作，但是根本感受不到当年在张老板手下工作时的那种激情和动力。”

4 月一个温润的傍晚，在那间灯光辉煌的办公室，我再次与张大中见面。他刚刚旅行归来。这次，他开着一辆 BMW 越野车与一群朋友到美丽的皖南山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自驾游。途中，他曾用手机给我发来一首描绘风景、抒发友情的诗歌。诗以古体写成，读来琅琅上口。我问是不是他写的，他笑着说：“不是不是，是同行的一位朋友写的。你一定感觉纳闷：大中的文学水平怎么突飞猛进了呢？”他又大笑起来，靠在椅背上，神情很是幸福。那是一个经过多年奋斗之后，享受美好人生的男人的笑容。

他告诉我，如今他在业务工作上只需投入不到 1/3 的时间。在股票市场上学习了一年后，他做了几个重要的投资决定。他将 10 亿元贷给了一个为客户提供商业贷款的国家银行，他认为这些客户相当稳妥安全。然后他又用 20 亿元分别购买了几家风险较高的公司、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他说：“不过，我是在低位进入的，而且属于长期持有。”或许，就像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低迷的阵痛、经受着从旧有的加工出口模式过渡到前景不明的新阶段的压力一样，张大中个人的长期计划也需要时间来塑造成形、发展壮大。现在，有一个监察市场的团队随时向他汇报情况，他就可以用余下的 2/3 时间来给自己“充电”——旅行和阅读。在北京时，他会定期打网球。这个爱好他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他笑着说：“球友们都说我最近球技见长。以前我一年 365 天都在工作，脑子里永远想着跟销售有关的事。所以我在网球场上总走神儿，球经常会打到我的脸上！”

除了在中国旅行外，他也常出国前往北欧、加拿大和南美洲等地。他给我讲他读过的一本回忆录，关于一位美国投资人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的故事。“他也是 60 岁左右。有一次，在非洲，他遇到了一帮占据金矿的匪徒。他居然深入到这群土匪当中，详尽了解了开采金矿的整个过程。后来，在他决定何时投资金矿的时候，这段经历起了关键作用。我出去旅行倒不是为了找金子，但我相信旅行会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心灵。”

阅读是张大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的阅读方式也显示出他一贯的严肃与有条不紊。（他曾带我看过去与他办公室在同一楼层的健身房，工作之后他常去那里健身。健身房紧邻一间卧室，如果在公司工作到太晚，他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熨得笔挺的衬衫和长裤分别挂在不同的格架上；结实的运动鞋和质地精良、刷得干干净净的皮

鞋分排摆放；袜子、领带、书籍和 DVD 光盘，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张大中说：“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里你能看出他的性格。”）在他诺大的办公室里，有长长的一面墙都是书，我在书架前浏览：商业、金融、历史、哲学、文学、东西方伟人们的传记等等。旁边，两张矮方桌上，整整齐齐、高高摞起一堆一堆的书，每本书里都夹着醒目的卡片。张大中有个由三位职员组成的“阅读组”，他们的专职工作就是每天阅读不同主题的书籍，然后通过综述、笔记和摘录的方式向老板做汇报。张大中说：“我无法从头到尾地阅读所有的书，所以我需要依靠这些笔记。”他说着指了指方桌上那几摞书。不过，有些书显然特别重要，他不仅会自己阅读每一页，而且还会买好多本与别人分享。

其中有一本毛泽东传记，让张大中深为震动，他特意找到定居伦敦的作者表达他的赞赏之情。2007 年，作者回北京，张大中请她吃饭，并表示愿为她日后的写作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尹缙琦是张大中阅读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对阅读组成员来说，这本毛泽东传记可并不容易读。尹是个身材娇小、开朗活泼的女孩，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干练得体，并且是金融经济学硕士。她读书很快，可以在一天之内轻松地读完一本大部头书，而且仍然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不过，她告诉我，毛泽东传记对她来说还是太难了，对于她们这种成长于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陌生”了。“张总对我们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必须用心细读这本书。”

那天我和尹缙琦一起乘车陪同独立制片人胡杰去采访，一路交谈。胡杰先前拍过两部讲述女性遇难者的纪录片：一位是“右派”林昭，由于批评当权者而被长年关押，最后被枪决；另一位是中学校长卞仲耘，“文革”初期被她自己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两部片子在民间则名声远扬。现在胡杰是受张大中之邀来拍摄关于王佩英的纪录片。那天下午，胡杰采访拍摄了王佩英以前的两位同事，现在去北京东郊采访一位目击者，他曾经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宣判大会，王佩英就是在那一天被处决的。目击者潘士弘恰好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采访。

当晚，在那间灯光明亮的舒适客厅里，潘士弘在摄像机前生动地描述了将近 40 年前发生在工人体育场里的情形。公审大会一开始，高音大喇叭先是播放响亮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随后是在场十万人一起反复高呼口号。12 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位是张大中的母亲王佩英——被带进场地。他们都被五花大绑，每个人都由三个红卫兵押着，强迫他们在地上跪成一排，并狠狠地压着他们的头。批斗开始，每次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判决时，押解人就会用手揪住那个被判刑者的头发，猛地向后一拉，让他或她抬脸冲着观众。现场的气氛从狂热接近沸腾，因为被判决的人挣扎反抗，可以看见地上扬起的一阵阵尘土。他们的脖子、手臂都被牢牢地捆住，被押解人从后面拉紧。最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们被拖走执行死刑。

潘当时只是一个 22 岁的青年教师，却时时感觉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因为家有海外关系，他可以轻易就被定为西方间谍。坐在人群中，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命令参加这个公审大会了——这是对像他这样的人的一个警告。“我很惭愧，当时我也冲着他们喊口号了，因为我害怕极了。”在那个年代，没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潘还讲了他知道的许多其他案件，那些有关殴打、羞辱和出卖的故事。他谈得最多的，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感。

采访完毕已是深夜，我们回到汽车里，所有人都沉默无语。当汽车平稳地驶入城郊之间一条新建的宽阔的高速公路时，尹缙琦转过头对我坦诚地说，潘士弘的叙述让她非常震撼。她说她的同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可能他们也不想知道。她说她只是因为在大大中手下工作才对此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我仍然感觉很困惑，”她说，语调迟疑，一副天真的神情，“这听起来太不像真的了，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潘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修养，人很随和。我想，像他这么好的人不会骗我们的。这些事肯定不是他编出来的，是吧？”

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为什么张大中会忧虑，会坚持要这些年轻人用心阅读毛泽东的传记。我想起胡蓉对张大中的一句评价：“他是一个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但我从没见过谁有他这样走出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张大中还会对我提起《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北京一所高中的学生向当局举报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了政府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过，报上的文章说，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该因言治罪。这个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安：对他们来说，那个青年学生举报老师的行为证实了他们的悲观看法，即文革的流毒仍远远没有肃清，尽管过去 30 年中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史的幽灵依然在人群中徘徊。

张大中却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他神情满意地对我说：“你知道，这样的报道就是在给人们普及关于法治的教育。它意味着，我们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发展了，政治上也在进步。”

后记

2010 年 3 月 27 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母亲王佩英遇难 40 周年纪念会。约有 500 人到场，其中包括许多老邻居和家族亲友。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軾先生发表了感人的悼念辞，赞颂王佩英是一个英雄、一个真理的殉道者。张大中在发表感言当中几次哽咽。他向那些在张家经历苦难的黑暗年代里曾向他们表达善意的人们鞠躬致谢。随后，人们排成长队，一一向王佩英的画像献花。每人都收到了一套有关王佩英生平的材料，包括一本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和一张 DVD 纪录片光盘。张大中还为母亲的油画肖像举行了揭幕式。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未受到任何的干涉。

2010 年 5 月 18 日，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公司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以 6 亿元罚金，没收 2 亿元财产。与此同时，国内媒体报道说贝恩投资公司已经在黄光裕入狱后购买了相当多的股票，将变成国美的第二大股票持有人。

黄光裕何以获此重刑，我迄今仍未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在茶余饭后传递着各种小道消息，涉及此案的法律程序和大量信息却仍然晦暗不清。不过，在北京与本地商人的交流中，我常常听到对黄光裕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极其冷酷无情的人。他的供应商都恨他，因为他压价太低，让他们几乎没什么利润可赚。有时候他会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对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的是黄光裕是如何处理一个“叛徒”的：一个曾在国美供职的公司管理人员离职后自己创业，成了国美的竞争对手，黄光裕的人决定给他一点儿颜色看，于是

把他痛打一顿，竟然打成了残废。按照坊间的说法，这个人后来坚持不断提供的信息成为调查黄光裕并把他送进监狱的关键。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似乎表明，一个人过于贪婪、对他人过于强势，最终必会招来怨恨、垮台灭亡。按照流行的观点来看，此案无非是由于黄光裕是个无良奸商，做得太过头。至于事情的另一侧面——他培植的官方后台势力不够强大，没能保住他——大家对此虽然不大讨论，却都心知肚明。

续后记

2011年3月9日，经过一场明枪暗箭、一波三折的博弈，从黄光裕入狱后一直执掌国美电器公司大权的陈晓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由张大中接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并担任非执行董事。但张大中本人显然并无重返家电业的意图，他也并未卷入此前国美内部的种种纠纷争斗。或许，作为一个公众形象良好、各方都能接受的行业前辈，他只是帮帮朋友的忙，每年开几次董事会而已。“你没注意到我的名衔很有意思吗？”他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当的是非执行董事。”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王佩英案。这一次，终审判决书不仅推翻了对王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且撤销了1980年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判决书，宣布王佩英无罪。“精神病”的“尾巴”也去掉了。

一桩深藏几十年的心愿，终于了结了。将终审判决书付印送发各界友人时，张大中附信的标题是“苍天有眼，善恶有报。”

京城来信——一对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夫妇是如何成为中国知名房地产商的故事

英文名：The turtles

张欣喜欢谈论她在剑桥和苏赛克斯学习时着迷的左翼英国知识分子。潘石屹，张欣的丈夫，他是一个笃信道教、传统的甘肃农家孩子。当你在电视或是杂志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穿着上海滩那种装束：潘会戴着黑框眼镜，也许还会配以丝绸锦织夹克；张欣一头染成金色的头发则垂在眼前，也许还会穿着无袖普通T—衬衫，上面或许还会有个蝴蝶结。他们看起来就像艺术造型师或者电影制作人。事实上，他们是搞房地产的。他们建造复式公寓、写字楼和大型购物中心。张欣39岁，潘石屹40岁时，他们分别是soho中国地产集团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soho中国房地产开发公司是中国最耀眼的地产大亨。

去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潘和张举行了一个晚宴以庆祝他们最新项目——建外soho的开工，十二个白色的极简主义风格的高层建筑排列在北京最主要的大街——长安街两侧。尽管当日细雨绵绵，各界名流仍通宵达旦的发出耀眼的光芒：商界精英、政府官员、建筑师、出版商、艺术家、时尚编辑、演员。各个争奇斗艳。一场突如其来的细雨打破了当天的剪彩仪式，很多人都行色匆匆的走过当天的红地毯；正式的晚餐是在一个白色帐篷下面，五百位来宾当中很多人都冻的瑟瑟发抖。但是晚会的魅力依然不减，简易帐篷下带着Bulgari珠宝，

身着华伦天奴服装的人们依然来回走动。稍晚，一群来自南美的专业舞蹈演员给大家带来了专业的 tango 舞步。晚会的主人却独自安排着各项事宜。他们二人像这样在一起只有这一次。潘石屹身着普拉达西服，嘴里不断感谢今天到场的中国来宾。张欣身着天蓝色丝质旗袍上面以一条黄色的龙装饰，流利的英语感激着来自海外的来宾。

今晚，让我想起两年前类似的情景，那次为了庆祝潘石屹和张欣在长城脚下的建筑长廊完整竣工。长廊分为 12 个梦幻般得房间，每间屋子的设计都是由一个亚洲顶级设计师所设计。其中一间是由 Shigeru Ban 的作品，房子的材料全部由竹子制成。另一间由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北京建筑师张永和设计，整个房间以地球的北京装饰。12 间房屋的每一栋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即使对于北京的新富阶层来说，花费这么多钱仅仅用来显示一下自己奢华的周末生活也是很有负担的事情。项目的名称后来被改为长城的宣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项目的诞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会议中心和旅游中心了。

建外 soho 规模前所未有的：当所有工程完工时，届时将有 20 栋高楼以及 4 栋别墅，占地面积 700000 平方米。整个项目的总价值在 12 亿美元。每平米的售价大约在 2000 美元左右，这个价格很高，但是并未超过那些被现代的建筑风格、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巨大的天窗玻璃和木质装饰所吸引的消费者们的期望价格。截止到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刻，百分之八十的单元都已经被销售出去了。

庆祝晚宴并非单纯的推销楼盘的活动，潘石屹和张欣还有更为深刻的考虑。今天早些时候在新落成的建外 soho 的会议大厅内，他们召开了一场主题为“用建筑的语言：中国对话世界”的研讨会。除了建外 soho 的设计师日本著名建筑师山本里显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发言人要数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合作伙伴，潘石屹和张欣另一个项目——一座矗立在长安街紧邻建外 soho 高档复式公寓的设计师 Patrick Schumacher。Schumacher 缓慢的滑动着幻灯片的影像对着拥挤的大厅人群演讲，旁边是张欣为他做翻译。在他身后的屏幕上，密集的介于金色和银色的建筑一闪而过。我听哈迪德设计人员把它们说成“鱼群”。

当人们谈论潘石屹和张欣的时候，经常会浮现出他们是一对“海归”。在中国，人们经常把像张欣这样接受西方教育的人称为“海归”——在中文中跟“海龟”同音，意指他们是从国外接受精英教育而学成归来。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紧密的与全球经济紧密融合，“海归”们的数量也逐年增长。（海归们对我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回国。”）而与此相反，人们经常会把像潘石屹这样的人称为“土鳖”。（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本地的一种乌龟，常常有鄙视的意思。）如果说“海归”代表了国际化视野的话，那么“土鳖”就是那个知道事情该怎么做的人。在中国，潘石屹和张欣就是海归——土鳖最佳搭档的代表。但是，正如他们所熟知的。海归与土鳖的联合之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如果你漫步在如北京这样的城市的话，随处可见塔吊、脚手架、钢筋结构、残存的旧楼结构以及等待完成的新建筑。然而，那些工程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们却毫无任何理由的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在中国，房地产商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强盗，他们利用私人关系、贿赂和贪污实现资本的流通。

如果你收到邀请参见一次房地产商们晚宴的话，有人就会告诉你，房地产行业两年后就会发生崩溃，或者给你讲一个故事，说的是附近的居民由于地产商和官员们的内幕交易而沦为了无家可归者。最近有部电视剧叫“冬至”（译者：我没看到啊）就反应了时下流行的观点。

这是一个中国内陆地区风景如画的古镇，在中部崛起的号角下，房地产商们正如强盗的手法那样席卷这里：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是贪婪成性、诡计多端的捕食者，而他的手下则是冷血无情的杀手。一位北京的房地产企业家告诉我说，“我看过这部电视的所有剧集，这是最接近现实的写照——尽管它只是揭露了这个行业的冰山一角而已。”潘石屹说他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形象，不过说起来房地产商的形象也确实很差。

潘石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房地产商。出生于中国西北甘肃省境内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的他，从小到大一直在饥饿和政治迫害的阴影中度过：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而他的母亲则常年重病不起。潘石屹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经常担心会挨饿。当他在北京附近一个小城——廊坊大学毕业之后，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成就，他被安排到一个有着 40,000 人的巨大的官僚机构石油部的管道处工作。从那时开始他相信这仍然是个毫无前途的工作。

“我辞职是因为这是一个开放而活跃的时代，”潘石屹说这个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他位于 soho 现代城巨大的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soho 现代城是一群巨大的矗立在首都东部的现代化建筑群。巨大的舷窗，满眼望去就是长安街熙熙攘攘的车流人群。巨大的办公桌上散落的摆放着各种文件，主力和秘书们正忙于收拾。“领导人的讲话和行为可能会影响大部分人民。比如上个世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位衣着西服的改革派领导人最终却因 1989 年暴动而过早的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潘石屹淡淡地说。“在那种政治氛围当中，我觉得我在办公室里的的工作毫无意义。”

1989 年，潘石屹去了当时还很落后的海南岛省，只是因为它刚刚被宣布作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特区”。在当时的海南岛免除了很多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不合时宜的规则。“那里真是又脏又乱，很多地方还没电。”当时，潘石屹就睡在海边的一个潮湿的工棚里，每天早晨起来和朋友们走着去当地的一个海滩上上厕所。有个男人还在旁边大便，另外一个男人就尝试着向我们兜售手表。他把自己的衣服袖子卷起来，给我们看上边带满了手表的胳膊。我朋友挑了一只手表，但是那个卖表的小子说“这块表不能卖给你。”我朋友问他为什么。那个卖表的人说：“因为你的钱包被人偷了。”我们转过身来看钱包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那个小偷就紧挨着我们。我们赶忙去追他。他给跑掉了。这个岛上的居民比我们跑得快。我们追累了，停下来休息休息。那个小偷也停下来喘口气。这就是我在海南的第一次经历。

最终，在 1992 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期间他要求改革的步伐要加快。中央政府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的发展制定了规划，并给予了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没有的自由创办企业的豁免政策。潘石屹和他在南方遇到的五个年轻人以及那些北方来的知识分子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万通集团，他们准备要着手自己的房地产事业。然而这里有个问题。他们缺乏资金。

冯仑，万通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国务院副局长的智库，在北京和海南方面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这六个人开始游说来自北京的一位国企老总，并向这位老板兜售自己的商业计划。这位老板同意向他们出借 500 万元的资金作为启动资金，作为回报：他要求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以及未来获利的一半。这六个年轻人用这笔钱买了 8 栋别墅，每平方米的价格为 3000 元人民币（约 350 美元）。两个月以后，并没有买家出现。日复一日的，这些年轻的投机者们坐在他们破旧的办公室里竭力想找出一条出路。

潘石屹回忆说：“我们总是无数次祈祷奇迹的发生，”第三个月的时候，买家开始陆续出现了。潘石屹以每平方米 4100 元得价格卖出了第一套别墅，来自大陆的他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山西

的企业家。不就之后，其他买家陆续出现，对于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客户来说，潘石屹把价格提高到 4200 元卖给了他。很快，他又以两倍于初始价格卖出了别墅。

这种房地产投机生意是海南创富神话中的一部分；一大群冒险者和投机客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主。在海南当地的俚语中，这个过程被称为“炒楼”也就是“建筑狂潮”。许多现代资本家正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这一过程被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

冯仑现任万通集团的主席，他描述在海南的时光是说就想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政府管控能力弱，规章制度模糊，狂热追逐财富的年轻牛仔。“很多奇怪的事会在那里发生，”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们正抽着雪茄坐在他北京宽敞的办公室里。冯仑是一位头发稀少，带着眼镜的和蔼中年人。仅有的稀疏头发整齐的梳理在他的头上，乍看起来，冯仑更像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商业大亨。“举个例子来说，在一场商业争执当中，你也许会在夜总会被骗。你被逼蹲在一个阴暗的小角落里，头上有枪指着你，你不得不被迫签下合同。我们公司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任何时候，有的人就那么消失了，或者被谋杀了。政府的公章都可以随便伪造。不管怎么说，那种时光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你突然进入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区域——没有法律，没有限制，不用担心那些抱残守缺的传统事物。”

冯告诉我们了一个关于北京干部去海南夜总会（实际上就是妓院）的一个紧张多彩的趣闻。在那里，他们极尽淫荡下流之能事。“当你当地的主人邀请你去夜总会的时候，你不能拒绝他，”他告诉我。“因为人们都是在那里谈生意的。”也许你会说：我是个好人。那么你就不会有什么生意了。”对于冯仑这位有政府背景的人来说，他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适应了没有秩序和安全保证的环境。“然后，你就会发现生活有多么自由和疯狂，而且你会发现你感觉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种经历改变了你的世界观，改变了你对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冯仑描述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十五岁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20 岁入党，从小到大他都是学生干部。“然而，到最后。砰地一声。我完全换了一个人。”

“那么你变成一个坏蛋咯？”我问他。（坏蛋，在海南专门指那些破坏规矩的冒险者们。）在其他场合里，我听过冯仑说自己是“坏蛋中的好人，好人当中的坏蛋。”

当我问这个时候，他哈哈大笑，“不，我想我只是想变成一个正常一点的人。”

当潘石屹谈论海南的时候，他更多的侧重与商业上的事物，就想硅谷那些互联网公司：“你进入市场提高了市场价格，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控制了一项投资，并确保你能及时的进出。如果不能进入一个上升时期的市场就是蠢蛋。但是更为聪明的人却不仅仅是随着市场行情漂流。当你离开的时候，其他人仍在跟进，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撤退。”在参观当地的规划局的时候，潘石屹注意到两组数据。首先，海南的外地人口比当地居民还要多。其次，以人均来算，海南只是个贫穷的岛屿，而其建筑的速度比北京还要快上七倍。潘石屹觉得这里面存在着房地产泡沫。是时候清仓了。不久以后，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了，潘石屹从公司的账上借了五万元离开海南去了北京。

张欣来自一个长期排斥华人的国家缅甸。20 世纪五十年代，排华浪潮席卷整个南亚地区，他的父母决定搬回祖国大陆。他们在北京结婚，并且都被分配到了北京外遇翻译局工作。但

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两个派别互相开始了争斗。张欣回忆道。这对夫妇 1970 年被隔离，那个时候张欣只有五岁。很快她的母亲就被派往河南农村的一个劳改营里去了。

张欣的童年充满了坎坷。她的母亲是一个活泼而吃苦耐劳的女人，当她离开家庭的时候，发现给亲朋好友们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张欣说，她小学的时候大概转了 7、8 次学。即使 1972 年她的母亲又回到了北京，生活依旧艰辛。“开始的时候，我们睡在一张办公桌上，”张欣回忆道。“每晚我们要在办公桌上垫上一本字典，以防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把其他人弄到地上去。”

不像其他中国孩子，张欣很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在缅甸有很多外国人，而且那里有很多说着“奇怪的外国话”的电影在那里放映。“我有着天然的语言天赋，”张欣说，“不像潘石屹那样，他只有一种语言环境当中成长。如果一个外国人带着些许口音说中文的话。他会认为这家伙正在说外国话。”

1980 年，张欣 14 岁，她跟随母亲来到香港。生活在一间狭小的公寓当中几乎没什么钱。不就他们都到一家服装厂工作。之后，张欣在一家电子装配厂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些流水线都是大家伙”她带着坏坏的笑容回答说。“超过 20 层楼高，几百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都是一个小型的工厂。工人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没有任何归属感。他们频繁的更换工作岗位也许只是从这个流水线换到另外一个只为了能多拿点薪水。”竞争十分的激烈，但是却是低水平的竞争；手快的工人都是那些计算能力超强人。张欣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做办公室的职员。

两年以后，张欣 16 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座位仓库保管员的职位，在夜校里她爱上了自己的数学老师，在那个时候，她得到了小小的对于幸福的满足感。但是，1984 年儿时的伙伴来香港旅游“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张欣如是说。这个年轻人英语流利而且在大学读书。“天哪，你在这的生活糟糕透了。”他跟张欣说，“你该去美国读书。”

张欣选择了去英国。1987 年，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在牛津大学在香港的学校学习英语，张欣收到了苏塞克斯大学的入学通知和奖学金。这笔钱能够支持她去英国留学了。当她从一个聚集着全英国知识分子的苏克塞斯大学离开时，苏克塞斯大学在张欣眼里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和行为怪异的人。她记得有个同学从来都不会洗自己的长头发。（“他头上就像长满了粘稠状的蘑菇。”）但是，最重要的是，她非常欣赏她的左翼教授。“他们当中很多都参加了 60 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浪漫的。所以一个形而上学的探索与我们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很多学生却丧失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但是张欣依然向往欧洲那种罗曼蒂克的共产主义。“中国总是对文革带来的伤害滔滔不绝，而与此同时他们都在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家庭添置“八大件””她说（“八大件”类似于家用电器、比如电视、收录机、洗衣机等等。那时中国十分缺乏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还是比较怀念在香港流水线上工作的日子，社会主义让我变得尤为复杂。”

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发生了。“我不得不终止我的学业，”张欣会议道。“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盯着电视机。所有校园的中国学生都是这样。不久，大屠杀的新闻就出现了，我们在晚上乘火车赶往伦敦，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当时大概有 10000 人。那是我大学中简单

生活中最让人激动的一次了。”

张欣的论文就是讨论中国的民营化进程的。“我对此很怀疑，”她告诉我。“论文讨论的诠释如果民营化会产生哪些后果。” 1991 年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之后，张欣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研究生在剑桥大学工作。在那里她见到了很多雄心勃勃的有知识的中国年轻毕业生；他们中很多人都在 90 年代改革的时候回到了中国。在这些年轻人的聚会中，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个不变的话题，张欣感到她的未来在自己的祖国。

当她在剑桥完成硕士学位的时候，巴林银行派人去剑桥考察：他们的香港支行需要一个人分析中国的私有化进程。由于张欣刚好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她立即就被雇佣了。去香港，她指出这是回到中国的第一步。她并不知道巴林银行已经被高盛收购了，1993 年夏季的时候，张欣发现自己却来到了华尔街。

正当张欣在华尔街做一名年轻的分析师的时候，潘石屹在北京也走上了一次新的商业冒险。一天，当他正在和一些政府官员吃饭的时候，他听说中央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文件允许创立有创新技术成立控股公司。于是一场疯狂地准备活动随之而来。潘石屹找到了每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万通要想在北京发展的话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游说了几个国企的老总共同出资成立一个联合控股公司。终于，六个月以后，北京万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了。合伙人的注册资本为 800 万人民币（约合 100 万美元。译者：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作为新够公司的注册资本。在中国，数字“8”就意味着“发财。”

但实际上，这些钱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在新的规则体系下，该公司两个月以来为筹集资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股票价格。潘石屹几乎占据了金融报纸的整个版面。他吸引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在内的整个证券委员会大小官员的关注。潘石屹被要求出现在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当中。

面对一屋子的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万通公司的广告，潘石屹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难道是被发现了什么违规行为了吗？“年轻人，放松点”一位官员说着，并且询问了他新上市公司的注册情况。潘石屹告诉这个官员说，公司资质的证明文件完全是按照改革委员会的章程来办的。官员默许的点了点头：北京人办事讲究规矩，比那些没有规矩的海南人要好。他拿出了在海南的股票交易证明。“看看这个，这些东西完全是在大街上买的收据。”结果出来了，这个国家正在试验一项前所未有的股份公司的项目。在这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关于公司的法律制度，政府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开一次听证会不过是想要看看这些公司的承受能力。

潘石屹记得一首舒缓的歌曲叫“像雨，像雾，又像风”当他驱车回家的时候，这首歌完全的抓住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玩转北京市场。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公司的新项目——万通新世界大厦位于北京的核心地区，是一项政商两用的复杂工程。潘石屹在这个工程项目的成功相当于给万通公司在传统的中国做了一次新奇的广告。万通拿出了在当时一千万的天价买了一场空前的市场营销计划——在当时的主流报纸中，《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文汇报》、《香港大公报》上面进行了风暴式的广告宣传。万通新世界广场的价格均价飙升到了 6000 元/平。这在北京市前所未有的。所有的销售单元都被承包商们抢购一空。终于，公司的最终投资回报翻了三倍。

张欣在华尔街的薪水非常好——六位数的薪水以及各种福利和补贴，然而她对这里的风气十分讨厌。“在华尔街，所有的价值观都颠倒过来了，”她说。“人们举止粗俗，经常恶语相向。瞧不起穷人并且膜拜权贵。他们为了名利可以任何事情。无论是谁赚了大钱都会被当成英雄，每个人都在互相勾心斗角。”这让她想起来在香港流水线上工作的日子。“在那里非常的不同，在香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只是老鼠们目光短浅的竞争，而在华尔街他们把这种竞争转变成了狼和老虎之间的生死搏杀。”

张欣有很多旅行的经历。“我经常拎着箱子，每个星期在三个城市之间旅行，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回的徘徊。”她回忆到。“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的判断能力。这个工作根本就不需要我在学校学到的那些东西。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些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这简直是在浪费人才。”

1994 年，她离开高盛集团，作为一名投行的工作人员加入了一个旅游集团。这项工作压力小些，但是长期出差仍然让人精神紧张。她渴望回到中国。一位剑桥的校友问她是否对一家名叫“万通”的中国公司感兴趣。

飞回中国的旅程是非常疲乏和无聊的，张欣拿出了同学给她邮寄过来的招股说明书。这是万通的使命，标题就像那些宣誓：披荆斩棘，为了未来，我们共同奋斗。文中继续在重复着同一誓言。“这让我太兴奋了！”她回忆说。“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想要建设他们的国家，他们关于建筑行业的远大梦想正好跟我所有的浪漫憧憬志趣相投。”那是 1994 年 5 月，很快她的飞机在北京着陆。她参加了一次与万通合伙人的会面。

四天以后，潘石屹和张欣经介绍互相认识了。“他对机会的把握非常敏感。”张欣笑着说。

尽管最初的交往中，他们的私人交往仅仅限于商业合作关系。潘石屹有些模糊的想法想要吸引外资，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做。张欣也想要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她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开始。她在万通发现了很多东西，包括模糊的商业目标，越权领导的体制，以及某些可爱的地方。当她被带到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她深深的震撼了。“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建筑工地，”他说。“它们如此巨大，完全震撼了我的心神：中国，正在在地平线冉冉升起的国家。它非常雄伟。随后，我又跟着陪同人员游历了长江。它们在长江的渔船上开公司的董事会，我在那个时候也加入了他们。这让我感觉这里完全不同于华尔街。”

张欣和潘石屹在 1994 年 10 月结婚。一年后，潘石屹决定离开万通集团，而张欣则离开了华尔街。她和潘石屹将要开始自己的公司。他们把公司命名为红石。（三年后更名为 soho）

“冯仑肯定非常讨厌我，”当我告诉他我会和万通公司的主席会面时，她如是说。

“因为你是当年插足乐队的“小野洋子”吗？”

张欣笑了，但那只是她自己这么认为的。事实上，潘石屹和自己的老伙计们关系很好。在北京的一个最繁忙的商业十字路口出，潘石屹和冯仑各自公司的巨型波浪形广告牌相隔仅仅 50 英尺。

北京的媒体是如何描述这一次“东西方的碰撞”以及“本土集团与外国商业是如何联合的”。但是“海归”与“土鳖”之间的紧张关系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在他们大堡礁的蜜月旅行当中，这位新人就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潘石屹被自己新娘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惹火了：她对中国太无知了！她对中国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知晓。至于张欣这边则深深的被潘石屹缺乏理想主义信念而震撼。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不断蔓延，尽管当时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公司开始工作了。张欣说 1996 年和 1997 年是她生命中最困难的一年：她整日都和自己的丈夫争吵。

在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东西方差异的冲突。张欣或许觉得在华尔街她是一个局外人，但在中国的商业世界来说，她自身是如此的西化，以至于感觉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人。她要坚持召开公司全员会议让每个人都了解公司内部事务、提供建议，因为她想坚持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和解决问题。但是潘石屹的经验告诉自己运行自己的公司最好还是要靠自身良好的直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辩解，没有什么重复的言语。“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是一个商业公司就需要专制，否则一切都会付诸东流。”他这样教训员工。

张欣和丈夫从万通公司带来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脆弱。这些人认为潘石屹的“外国媳妇”非常的容易怀疑和嫉妒他人。而张欣则发现她那些关于质量和细节的想法则很少受到同情。每次她否定了由她员工所作的一些工作中，她发现这些工作有 99% 都“不符合标准”——她得到了相似的答案。“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很明显的，中国的国情最后成为了一种“将就、凑活”的心态了。渐渐地，张欣开始怀疑自己在工作中所进行的民主尝试。它似乎导致人们总是滔滔不绝的谈话而不是踏实的工作，并且，他还发现，一旦官僚等级意识弱化，就很难命令人们工作了。她开始感到一种挫败感。

对于北京人来说，潘石屹和张欣的名字经常和一座复式办公楼 soho 现代城联系起来。这最初是“红石”的一个主要项目，但是却前景暗淡。土地原来属于一个大型酒厂，周围不远的地方就散发着恶臭。潘石屹和张欣在一个雨天对这个地方做了一番调查，他们踩着泥浆捂着鼻子做完了这次调查。张欣对于在这开展项目很不满意。

潘石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这个地方位于发展迅速的朝阳区的主干道上，周围临近外国使馆、国际酒店和大型购物中心。传统上，北京市沿着中轴线发展的，但是近期的发展趋势是向东迅速的拓展。新的地铁线路和高速公路在两年内就会开通；因此，整个计划就是在两年内清理恶臭的河岸就行了。这个区域的限制也可能会比中心城区要小得多，所以这里也适合建筑更高层的建筑。其实潘石屹也在打赌政策上的突破：到目前为止，政府并没有允许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政策，但是他相信，未来的几年里这一切就会实现。而那时整个工程也刚刚完工。个人抵押贷款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他们的高档公寓。简而言之，直觉告诉他地理区位和时间这两个关键的房地产因素都站在他们这边。

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开发商都在追逐热钱，一个工程在动工之前经常被转承包了很多次。张欣非常蔑视这种趋势，她打算向国际建筑商寻求帮助：她想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建立一个宏伟的项目，就想香港的太平洋地产那样。潘石屹对此却颇为怀疑：他认为那么做可能会牵涉很多部分而且耗时太多。但是他选择相信自己妻子的专业知识并提高外资的水平。因此张欣开始了工作，她把目光转向了小的投资者，以此来吸引主要投资者的注意。经过两年的谈判，GIC 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集团最终同意投资这个项目。

然而，由于 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项交易不得不中断。潘石屹十分生气的告诉张欣说：如果他们不得不和小的投资商合作的话，那么这项工程的耗时将大大的超出预期。张欣收拾了自己的行李飞向了西方去会见自己的老朋友。潘石屹也去了日本散心，看起来这段婚姻就要结束，双方要分道扬镳了。

在英国，张欣一直在一个朋友的乡村公寓住着。尽管周围景色优美，绿树环绕，马儿在周围尽情奔跑，她仍然感到厌倦：西方的生活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如果她现在不回中国的话，她就永远也不会回去了。如果她想和潘石屹继续下去的话，她就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与自己的丈夫工作。

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会辞职的，”她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而起她说自己想要个孩子。张欣说这是自己曾经“最理性”的想要确定自己的生活。“仿佛给自己硬找了个椅子然后使劲坐在上面靠在椅背上。”

她回到了北京，并且很快怀孕生了两个儿子。潘石屹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与小的投资者合作。他签了一份又一份的建筑合同。与此同时，夫妇二人委托建筑大师曾经主持设计长城酒店的设计师张永和为他们在城郊建立自己的新家。

张欣来回奔波监督工程质量，与张永和设计师会面交谈。对于他来说，建筑师是家族行业：他的父亲主持设计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但是这个受美国教育的儿子却有着后现代主义情怀，体现了一种折中艺术。特别强调文化层面当中的建筑。谈起他们的谈话内容，张欣说自己都能写一本关于建筑方面的书籍了。

“那就像是一个研讨会，”张欣告诉我。她对房子的设计非常满意，潘石屹和张欣打算把它命名为山间林语：高高的钢筋结构，石墙、巨大舷窗洒满了阳光。这是家庭渡过周末的完美体验。她和张设计师的谈话经历也唤起了她对建筑的热情。她回顾了所有她在香港、欧洲、美国看到的每个城市密集的人口以及高耸如云的高层建筑，特别有用参考是：那些摩天大厦的每一寸空间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这些是否能在北京实现呢？

潘石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却并没有充分利用张欣的才能。因此，在 soho 现代城开工之前，他的工作是有分工的：他负责金融方面的事物（签订合同，筹集资金，买卖楼盘，政府关系等），而张欣则主管建筑的设计决策，工程管理，以及国外关系事物。那个时候，张欣证明她非常适合这项工作。“她态度温和、浪漫，但是确是非常严谨而精明的生意人”张欣的一个海归朋友北京时尚杂志出版社的洪晃如此评价张欣说，“这绝对是强强联合。”

对于 soho 现代城来说，张欣寻找那些当地年轻的设计师并告诉他们要敢于尝试。这最终成就了 soho 现代城因一系列复杂新颖的设计而变得享誉海内外。相对于北京的传统公寓而言，soho 现代城的起居室很大，但是客厅很小而且没有阳台。窗子和天花板很大，而传统的设计师认为这样很不安全。传统工艺倾向于完全木质结构而不是尚未完工的白色箱子表面。不同于传统的灰色装饰，soho 现代城的颜色方案充满活力：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被广泛应用于每一栋楼。与此同时，却没有过于奢华的装饰，比如大理石地面和钢筋结构。一些公寓的墙体可以移动，以便能很好的适应办公空间的用途。“soho”的概念——小型办公，家庭办公——就是为了适应北京日益增长的数量众多的小型私人公司。

此外，为了给 soho 现代城增添艺术气息，张欣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一位理念艺术家，北京前卫艺术圈子固定的成员艾未未。让他负责组织地面的安装工作。艾未未多年来在纽约生活，只是近几年来才搬到了北京。他那制造麻烦的名声就足以吓跑大部分开放商了，但是张欣却答应他给他足够的预算，并保证给予他设计的自由。艾未未没有让张欣失望。非常准时的把十多个风趣、时尚并且富于现代气息的雕塑和装饰物安排在各个楼内的公共区域，以吸引年轻人。而这也正是潘石屹和张欣所要瞄准的目标市场。

然而，就当整体建筑已经完工，销售计划正在准备实施的时候，潘石屹的销售主管邓智仁却跳槽去了另一家企业。很快，邓就在“红石”的销售团队里找到位置，潘石屹多次在公共场合谴责这个行为。赶在进一步损失扩大之前，潘石屹和张欣仓促之中准备报告召开记者会。但是，突然之间，所有的开发商、记者甚至那些已经在 soho 现代城买了房子的业主都不断批评这个项目价格过高，质量太差。一个竞争对手，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称 soho 现代城为“垃圾房子应该被炸了。”他在电视上公开抱怨 soho 的设计只能得三分，在多功能住宅区审查标准中，这可是一个非常低得分数了。“那只是勉强及格”任志强愤怒的说。“建筑质量 3 分，出售价格 5 分，影响力却是 10 分。”

到底该怎么应对这些批评呢？“如果是一个英雄的话，他会拔剑自刎的，”潘石屹带着一个狡猾的微笑说着，而且他的下一步行动看起来也确实是在自杀。就在批评的狂潮之中，一个精心制作的收集了所有批评潘石屹以及 soho 现代城的杂志被送到了每一个读者手中——这本杂志是潘石屹自己出的。策略成功了：越是有很多的批评 soho 现代的人，那么潘石屹和张欣就能做出充分的防护措施以便解释他们的理念。他们对媒体说的那些就会更加的有说服力。直到现在为止，房地产行业没有人被告知或者有这样的知识：没有人想到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媒体关系。而且似乎没有其他的建筑工程项目喜欢被过多的报道。

“在那个年代，”潘石屹说，“只有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争议很多的人才能吸引到他人的注意。然后，大家才会更加关注你。”潘石屹引用了一位美国名人 Donald Trump 的名言：比如比尔·克林顿，克林顿的媒体在表现莱温斯基丑闻中给大家留下了什么印象。“那个时候，他看起来累坏了，然而他还是不得不去参加晚宴，会见外国领导人，”潘石屹点头说“那压力一定很大！”

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就在搜后现代城接近完工的时候，1999 年晚些时候，个人贷款最终被放行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中国政府不能再仅仅依靠外国资本和出口方面，现在必须刺激国内需求，以保持经济增长。在 soho 现代城的售楼处，人们彻夜排队，很快 2000 个销售单元销售一空。Soho 现代城沉了一个新地标。其现代化、简约的风格已经成为了建筑行业的流行趋势，潘石屹和张欣成名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位住在北京的香港商人告诉我。“在香港，商业巨子是真正的大明星。奢侈品展会上，坐在前排的大亨，在电影明星的陪伴下进入会场。但是，北京的商业大亨看起来更像电影明星或者艺术家。潘石屹和张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的解释非常简单。“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富豪难以向公众解释他们的财产来源，”他说。“来路不明：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十分模糊。他们不得不保持低调。”怎么能公开宣称是“太子党成员”呢？（太子党：中共领导人的孩子）通过父亲的影响力，控制媒体美化自己。难道这种影响是万年不变的吗？或者做出那些大型工程的人必定存在大量的贪污腐败和浪费公共财政基金？潘石屹出身贫寒。没有背景。确实，他们之间或许有着某种联系，你也许会问，他们在海南

的第一个公司的贷款是怎么得到的呢？但是这里面确实没有腐败的行为。”

毫无疑问，腐败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难以去除的顽疾。例如，直到现在，土地的买卖都不是公开的——投标人不知道其他人的标的。一个非投标人给政府官员们一点回扣就能拿到土地。尽管今年八月政府制订了新规则，规定北京的土地公开买卖。然而，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公司 GSC 的合伙人副总裁 Keith Abell 却说，“但是基于现有的公开拍卖法律，政府对开发商说”你们不投入任何东西就赚取暴利，现在你们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同其他竞争者包括外国公司竞争。” Abell 自 1979 年以来定期访问中国；而且在 Travelers Group 期间，是张欣的老板。十年前，当一个大型美国开发商找到 Abell 说他想进入中国，Abell 的建议是强烈反对，“我告诉他：你还没准备好你要去中国建设的某些东西，你又不是那个从湖南省跑出来的小伙子。（这里指毛泽东）”但是，他又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有个很大的改观。一些人仍然对北京的房地产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公开拍卖系统将会终结腐败。他们指出，防卫策略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中的一位官员解释“与购买土地不同，开放商们紧紧能够买那些工厂或者公司正在使用的土地。那样的话，他们可以绕开拍卖的过程，并且减少彼此的交易成本。”

在房地产行业，潘石屹和张欣受到广泛的称赞，不仅仅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已经逃离了通常情况下的中国土地交易的流程。而是，他们是怎么样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现在潘石屹和张欣已经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一份子，尽管他们总是热衷于建立自己专业的形象，此外，他们良好、透明的、清晰度高的规则为自己赢得了财务上的利益。2002-2003 年财年，soho 中国在单个项目上排名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位。去年 soho 中国的纳税也比其他房地产企业多。Soho 公司也买下了自己第一块公开拍卖的土地用于建筑北京的中央商业区。项目的名称叫 soho 尚都：一个占地 7 万平米的办公商业复合建筑群。Soho 尚都也是潘石屹和张欣最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由澳大利亚设计师 Peter Davidson 担纲总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被描述成“分形几何理论”，两栋高层建筑将会像冰山那样堆积起来。今年一月，这对时尚夫妻在尚都中心举办了一场为海啸的慈善募捐活动。这次募捐是由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那天的捐款额超过了 100 万元。其他地产商也紧随其后开办了类似的活动。

洪晃媒体出版人当她谈起中国第一代自主创业的富豪的时候，几乎要发了疯。（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哦，她告诉我说，中国的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法国。）“中国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的 Horatio Alger 故事，”她说，“看看潘石屹和张欣，他们一个事农民的儿子，一个事香港纱厂的工人。我太喜欢他们了。潘石屹就是中国的 Donald Trump。这样的成功故事在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并不是每个都会用这样乐观的视角看待问题。一名香港的学者和批评家写了一本关于建筑和城市文化的书，里面指责潘石屹和张欣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胡编乱造一些虚无的概念来炒作；在他看来，生活的方式和潘石屹张欣所倡导的建筑艺术只不过是粗浅、表面的艺术趋势。“如果人们认为真实的文化就是这样那么就相当危险了。”他说。潘石屹和张欣也经常批评忽视建筑必要的功能而附加一些本来并不重要的特色。“难道他们不应该为北京荒谬的房价负责吗？”批评家们说。

尽管如此，潘石屹万通集团的合作伙伴还是把潘石屹描绘成一个“房地产行业的天才”和“北京最成功的私人开发商”。他们从来不及潘石屹项目的建筑质量，而是他有本事把这些建筑卖得这么高价。在采访中，潘石屹很愉快的告诉我们他在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销售会议中是怎么成为关键人物的。“他们都盯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似的，”他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

办法，最后，他回忆说，利益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所有公司统统盯着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盯着这里，就好像他们都喝醉了似的。”

潘石屹有此说，“一个商人贪婪应该是其本性，但是他必须理智。”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比同行更贪婪更理智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集中于高档建筑这一细分市场：这里更加有利可图，而且风光无限。（他说，他正在等待政府开放二手房交易市场，他为我描述了一个社会金字塔：富人们买他的高档别墅，向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出售自己的老房子。）

“他是一个能够随时适应新环境的人，”万通集团主席冯仑说。类似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张欣身上。但是也许更为公正的说，为了适应中国她不得不做出的改变也许更多。这也许就是在全能行人才和当地人才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影响——存在于海归之间，海归与土鳖之间。尽管受到过良好教育，非常自信，知道自己的内在需求。海归们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调整。因为他们拿在十几年来在国外学到的理念和想法解决问题时经常会与中国本地的做事风格相抵触。海归将会带来一些新想法、新概念，但是土鳖知道游戏的规则，他们知道该怎么实现，或者知道哪些是不能实现的。

所以，如果没有张欣的话，我在想我该怎么区分潘石屹与其他房地产商的区别呢？比如冯仑。在全球化得浪潮中，确定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确实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张欣在我们的谈话中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感觉我们应该至少稍等片刻来谈谈我们现代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身份。现在的北京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长城、颐和园。我们渴望建立我们的大城市，但是从现在开始的十年间，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发现，我们起步太晚了。我们在北京所作的努力就是为了留下点什么，让我们不会感到遗憾。”

目前为止，潘石屹和张欣代表了土鳖和海归身上的所有优缺点。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结合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分别叫让和少。意思是谦让和缺少。这两个名字是潘石屹起的：名字来源于道教。那里面对于矛盾有相当微妙的解释。一天晚上当我和张欣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潘石屹就顺便走进了她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谈话。张欣办公室对面就是 soho 的建筑。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了一会。在离开之前，潘石屹以戏谑的口吻说，“那么这里今天晚上就没有我什么事情咯？”

“出去吧！”张欣硬生生地回复。“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但是，当我们在 soho 现代城公寓参观的时候，他又以自己的方式出现了。“我们为自己在每个我们开发的项目当中都保留了一间自己的公寓。”张欣告诉我。公寓是联排式别墅，宽敞而舒适。可以轻松摆放 Ikea 风格的家具，大型吊灯以及观赏性植物——这里绝对是雅皮士们得理想居所。晚饭很简单：粥、猪肉馅饼和绿叶蔬菜沙拉。我们三个聊了会天，我分享了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海归》。潘石屹半开玩笑的说“你知道，如果你仅仅写海归的话，你会伤了我们这些土鳖的感情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问张欣，当她回国时候是否会当做是多次的“临时住宿”呢？

“是的，”她说。“事实上，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把自己的行李从国外弄回来。我不得不说服我自己适应这一切。”（译者：de-educate 求解释）

她承认她改变了那种浪漫的“市场拥护者”的情怀。但是中国那些傲慢的新富阶层，她说，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角色。她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更加文明，或者仅仅让人们更加物质呢？她层级想成为一个有知识，对社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现在她却成了一个富有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富人们往往被人认为是缺乏社会公德和公共精神的。

现在是午夜。我们坐在加长的玻璃桌子前，旁边是一个巨大的舷窗。张欣管它叫“庭院中的天空”。公寓内黑漆漆的。男孩子们已经入睡几个小时了。潘石屹此时也不在这里。晚上真的很冷了。

我提出了关于土地买卖的普遍问题，这个过程当中的“腐败问题”，中国商业和生活当中的“灰色地带。”我问张欣对于一个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的人来说对于这些是怎么看的。

她谨慎地说。“西方人对中国有着简单明了的理解：任何事情都不能和“关系”撇清关系。西方人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是像西方政府那样简洁高效。中国有太多的政府部门了：市、县、乡。一个政府旁边是另一个政府。这些政府乱成一团。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的一些顾客走进大厅一次就买进了几十座公寓。你不知道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你只知道有些中国人就是非常有钱。试图弄清每一件事是徒劳无功的。有一次，我关于这个问题跟潘石屹有了一次争论，因为我对模糊不清的东西忍耐度非常低。我并不是那种能在黑暗中吃鱼的人。潘石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却如鱼得水。这就是他的正常状态。而我，也在慢慢的适应这种环境。

【赤脚资本家孙立哲】

英文名：The Barefoot Capitalist

我的朋友孙立哲又遇到麻烦了。他年前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想把他从一家出版社挤兑出去，而正是他花费了多年心血，才帮助这家出版社走向成功：它出版了许多畅销全国的图书，赢得过“中国最好的五家新公司”荣誉。听说立哲遇到了麻烦，我马上试图与他联系，却发现他跑到美国去拿西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企业管理文凭了。后来，我发现，他在美国和中国不同大学里同时报名兼修了多个学位课程——分别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当时他已经 52 岁，在这样的年龄重返大学校园，似乎颇有些奇怪。不过，回过头来一想，令我甚为震动的倒是，他这种不断重新开始的行为以及他变幻莫测的生涯本身仿佛就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写照。

2001 年春，我在北京逗留期间，与一些出版圈子里的人共进晚餐。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提到立哲在做出版。当时，我们坐在一家开张不久、颇为红火的杭州餐馆里。餐馆有三层楼高，光鲜的白色门脸，红瓦屋顶，喜庆而俗艳的内装修，来此用餐的顾客大多是刚刚阔绰起来的那些中国人。我们正在讨论中国的出版趋势——这个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复杂。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人们普遍预期政府的限制可能会逐步放宽。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正在与德国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洽谈。沈昌文，一位资深的北京出版商和编辑，当时谈到了中

国合资出版的特殊性，比如商业公司必须与政府机构合作。沈先生身材不高，剪着寸头，是一位生动有趣的人物。他在业界深孚众望，大家都认为他精明并且深谙政治。他永远对所有的小道传闻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孙立哲，一名美国资本家，目前是这个领域里的“大玩家”。

我不由得叫了起来：“美国资本家！难道您不知道他从前是一个赤脚医生吗？“文革”时期，他可是最著名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创举。当时，在偏远地区，农民还仍然使用民间方法治病，赤脚医生就是为这些地区培训的一批具备基本医疗知识的人。一桌子的人都茫然地看着我，似乎“文革”以及孙立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一样。然后，他们就继续谈论起贝塔斯曼的交易来了。

青年时代的孙立哲曾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把他们的知识用于中国的贫困地区。孙立哲志愿去了陕北农村，不久即显露出行医天赋。他的技艺提高极快，不长时间就能做大型外科手术了。生病的农民会从几百里外翻山越岭来找他看病。他的诊所，就是几间设备简陋的窑洞。在这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了几千例手术。他和几位助手还在诊所周围自己种植草药来配制药品。

随着孙立哲的名声远播，一个由中国顶尖内、外科医生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受命来到他所在的村子。专家组成员观看了孙立哲临床开刀，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位自学成才的医生技术之熟练，已经达到一位从医学院毕业并具有几年临床经验的医生的水平。消息传到党中央，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4年，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将孙立哲列入一个“模范知识青年”的5人名单中。那一年，他23岁。

当时，“赤脚医生”现象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孙立哲是这其中最有天赋也最成功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名人。报纸登载他的故事；电视纪录片和受众广泛的新闻影片都介绍他；他被赋予了不少金光闪闪的政治头衔（生产大队党支部分书记、副县长和地区卫生局副局长、青年团省委委员等），被捧为中国青年楷模。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北京读高中。在政治课上，我们都被要求学习孙立哲的生平事迹。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的某些荒唐做法得到扭转。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我们这些考取了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而不是在农场干体力活。

不过，新时代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亲善。尽管孙立哲基本是在诊所为农民治病，但那些落在他头上的官方头衔让他成为旧政权的一部分。中央某领导指示对其批判，命令省地县组织联合调查组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搜集证据。站在批判会场里，他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其中包括他从前的同事和崇拜者，他们向他高喊口号，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回到窑洞，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抽烟、喝酒。

他曾经两次想到自杀。后来，他借酒浇愁，结果得了肝坏死。不过，这倒正好救了他：他太虚弱了，经过斡旋，政府决定把他送回北京接受治疗。在医院，他逐渐得以康复，并开始与一位相貌平平但善良、聪颖的女子谈恋爱，对方叫吴北玲，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与孙立哲相识多年。北玲也是陕北知青，早就暗恋立哲，但他一直只把她当作普通同志来对待。北玲

不断来医院探视，带给立哲各种礼物—家常饭菜、新鲜水果、书籍—她守在他的病床边，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为了立哲的平反，她与一些朋友四处奔走吁请，利用家庭关系向政府高官为他的案子辩护求情。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是当年赴陕北的考察团成员，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院长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后，孙立哲获得了 1979 年大学考试资格。他所有的主科成绩都获得了当年的最高分，被录取进入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他的磨难终于结束了。

我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北玲首次带他到我们宿舍。孙立哲长得高大、帅气，非常善于表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英文十分流利，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而且他似乎对你能想得出来的任何题目都所知甚多。我想，当时我们都暗暗羡慕北玲竟会有这么出色的男朋友。她更是一谈起他就兴奋不已，不断赞叹他过人的记忆力、智商和旺盛的精力。我还了解到，他以前曾经口吃，他的个人卫生并不令人满意，他有时候行为举止像个孩子。通过北玲，孙立哲的英雄光环在我眼中逐渐褪去，变成了一位兄长。我开始像他所有的朋友那样称呼他“立哲”。

他和北玲带我参加过很多次陕北知青朋友们的聚会。吃着涮羊肉、喝着凉啤酒，他们会讲起过去那些神奇的故事，回忆起当年的艰苦、贫困、孤独，以及那个年代天真、强烈的理想主义。他们彼此揶揄取笑，但其中却渗透着一种深切的温柔，他们对陕西有着共同的浪漫情怀。陕西，那是他们的青春的代名词。

此外，我还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一个特征：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这群生长于舒适家庭的城市少年，刚刚十七八岁就投入到极为艰苦的劳动中。尽管他们才二十几岁，但几乎所有人在陕西那些年都得过病。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孙立哲去了同一个村子，当时每天上山放牛。某日，他忽然发烧、腰疼，双腿麻木，却无法确定病因。后来回到北京治疗无效，从腰部以下瘫痪，再没行走过。那年他只有 21 岁。

立哲被公认是北京医学院的高材生，但却未能完成学业。当时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不多，但开始有所传播，政府已经允许人们出国了。1981 年，立哲和北玲同时向国外大学申请奖学金；而后，他们分别离开北京。1982 年，他们在芝加哥会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直到 1990 年春，我才有机会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边的斯科基镇拜访他们。那一带民居是经典的美国郊区风格—车库里停着大块头轿车、车库门上面有篮球筐—立哲、北玲家的房子与周围其他房子看起来毫无二致。但房门一打开，这种美国幻觉就荡然无存了。立哲和北玲站在我面前，言谈举止就像他们从不曾离开过中国。家里到处是大沙发、大电视，后院支着一套烧烤架。不过，所有家具都像是从店里匆忙采购回来放在一起的，并不考虑外观和风格。北玲带我在房子里参观了一番，我惊叹于房子的面积之大。让我最惊讶的是二层，竟然有一排客房，里面放着相同的家具，每间屋都有一张床、一只桌子和一台电视机，看起来就像一家功能齐全、简朴实用的旅馆。

亲友们接二连三地前来走访逗留。立哲的妈妈帮着照顾两个孩子：一个神情阴郁的 7 岁男孩和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家里的气氛挺特别：既嘈杂喧闹，又有一种什么都无所谓和谐。北玲穿着一件家常旧裙子，拖着脚步走来走去，用她特有的那种慢腾腾、懒洋洋的声调说着北京话；立哲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加入谈话，一会儿张罗茶点，一会儿把孩

孩子们赶到外面去玩。开晚饭了，各式家常中国菜肴摆了满满一桌，立哲忙碌地绕着桌边给大家斟茶倒酒。那天的客人是一群在异国的知识分子，有北岛、张暖忻、李陀等，他们无视周围的喧闹，热切地讨论着政治。这场面很像陕西知青在北京的聚餐。立哲这位中国移民与他们“混”在一起，似乎与他昔日在毛时代当英雄模范一样得心应手。

不过，北玲看上去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和疲倦。她要把 7 岁的儿子声声哄去睡觉，我便随着她上楼。声声睡着了，我们坐在光线朦胧的卧室地板上聊天。在过去的 10 年里，他们的生活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在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为了挣钱，立哲曾自愿在医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对象，也曾卖过血。当他的哮喘病开始持续发作，他便利用这一“优势”，在一个哮喘病研究项目上做付费的研究对象。不幸，病况日益恶化，最终他无法再进实验室；摸一下实验用的白鼠就会引发一阵剧烈的哮喘。他只好放弃医学梦想，转而自行创业。北玲创办了一个家庭饺子公司，于是立哲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来。起初，全部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连立哲的父母也一起帮忙，跪在地板上擀皮儿、剁馅、包饺子。随着需求和利润的增长，他们从中国订购了饺子机，把家里变成了生产饺子的工厂。这个项目持续了两年。

此时北玲也离开了研究生院。她和立哲开始为美国公司从事英译汉的商务文件翻译工作。这促使他们开始了下一个商业项目—排版印刷。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家庭生意，但业务量稳步增长。

北玲仍深深痴迷于立哲的个人魅力。在一个满是婆家亲戚的大家庭里，她既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一个孝顺尽职的儿媳，但这个角色令她不堪重负。在生意上，她与丈夫一样充满热情，但她并不是天生的管理人才。夫妻俩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立哲的母亲个性极强，不太好应付。有一次，她和北玲之间起了争执，立哲跳起来维护母亲，并打了北玲一巴掌。“立哲是个大孝子。”我们下楼准备重新参与大家的谈话时，北玲说。

1988 年，北玲的腹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随后做手术切除了。第二年，她生了女儿珍妮弗。1990 年，就在我看望他们不久之后，肝上又发现了一个十几公分如大柚子大小的肿瘤，随后也被切除了。医生认为第一次胃里的瘤子是良性的，但其实是恶性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立哲对这个误诊结果怒不可遏。他告诉我说：“我曾建议医生，他应该假设它是恶性的，再多切一点儿。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个傲慢的混蛋只是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根本不理我。”

手术后，立哲带北玲回到北京。我仍然记得 1991 年春天我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情景。她面容苍白，极度虚弱，因为化疗，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但她看起来似乎比在芝加哥时更快乐。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而立哲则很憔悴，比以往更显得狂乱。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她则快乐地享受他的照料。他们的角色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她成了他的一切。后来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没能医治她深深内疚，而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也为自己没能更爱她感觉悔恨，尤其是想到自己欠她那么多。她于 1992 年 8 月去世。

葬礼结束后，他对那位误诊了北玲病症的医生提出诉讼。他开车跑遍美国十几座城市，访问了很多所医院，查询了大量医疗档案，搜集各类医疗信息和专家证词以赢得诉讼。这些材料最终填满了 30 只大纸箱。他回忆说：“我的律师看到这些惊讶之极，他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客户。”他的执着终获回报，他最终为北玲的两个儿女赢得了两百多万美元的赔款。

立哲后来告诉我：“那是疯狂的一年。我生病、破产、负债。在医院里楼上楼下两边跑，照顾北玲和我父亲（他那时也生了重病），我在医院旁边一间 6 平方米的小屋里弄了个小办公室，放了两台电脑，继续开展排版业务。我必须得赚些钱！”就是这样，他把生意带回了中国。

北玲去世后不久，立哲注意到，中国出版业尚未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法，他便从美国海运回一些高分辨率的彩色扫描仪。不过，该技术迅速流传开来，他也就失去了市场优势。此外，他发现当地的合作伙伴骗了他。他便把机器卖掉，退出这项业务，但仍然留在中国。此时是 1993 年，经济改革正在全国风起云涌。显然，一股巨大的商业浪潮正带领着全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未来。再一次，立哲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凭着他在美国的多年经历和出色的英文能力，他认为他可以将各种大有益处的美国图书引入到中国。他用卖扫描仪的钱做投资，很快创建了几家合资出版公司，出版图书和杂志。他投资创办的第一本杂志是《今日电子》，提供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各种信息。这本杂志拥有完美的政府关系——立哲的生意伙伴成功地取得了江泽民主席为该刊的亲笔题名。立哲逐渐参与到更多的合资出版活动中来，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技术上。他开始定期参加美国和欧洲的图书交易会，寻找有前景的书目并购买翻译版权。

事情的进展时好时坏。因为他早在 1990 年代初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他要在中国做出版，必须有一些中国合伙人。这意味着他必须依靠当地的生意伙伴——而他们往往有些是政府官员。他与前任官员签署的合同经常会在继任手上失效，他信任的人有时也会带着他的一大笔钱失踪。

2000 年，立哲与中信出版社联手。中信公司是一家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集团，但在出版方面没什么名气，资金也很少。立哲确信中国处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好时机当中：中国过去是一个政府很大、个人很小的社会；但如今，他认为，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因此，他推荐给出版社的书籍都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如何处理婚姻、离婚、养育子女、投资、获得成功等等。尽管从法律上讲，立哲只是一位顾问，但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信出版社的项目中，为它做业务策划和出版书目清单。他把中信的员工带到国际书展，教他们如何搜寻外国图书。他自己掏钱购买翻译版权。

那次在北京与几位出版商一起吃饭，我第一次听说立哲的商业活动。此后不久，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告诉我，立哲也在北京，并给了我他的电话。自北玲去世后，我再未见过他。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

“猜猜我是谁？”

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大叫道：“查查！你在北京吗？”他请我一起吃午饭。第二天，我乘出租车到东边一处新开发的园林式住宅区，在一座带有亭子式门廊的粉红色楼房前停下。站在大厅桌子后面的前台接待员看起来干净利落，穿着紫色的职业西服套装，化了妆。她问我找谁。

我把记事本上的名字报给她：“万国国际出版公司。”

随后我便上楼，按门铃。我听见一阵快速脚步声，马上知道那是谁了。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老了些。

“查查！”他大声说，“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

我也只好撒个谎：“你也一点儿没老！”

立哲笑起来，眼角皱纹仿佛一张收紧的渔网。“真的吗？”他满怀希望地说，把我引进门。“不过，我这儿得减减肥了。”他说着，拍拍肚子。他穿了一件整洁的蓝色衬衫，下摆紧绷地塞进裤子里。

“哦，这不算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最近几年，我在中国见到的许多中年男性，情况比这可糟多了，他们基本上成了缺乏锻炼又需要大量应酬的文化的牺牲品。几分钟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我确信立哲真是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双孩子般的眼睛，还是那样快活地大笑，还是那样一刻都停不住。

我向四周看看。办公室从前一定是一间公寓：除了三四个房间外，还有几个洗手间和一个功能齐全的厨房。有两间房里有床。每间屋里都有沙发、椅子、办公桌、咖啡桌、电脑、电视；塞满了报纸和图书的纸箱四散在地板上、办公桌上，或者墙角。整个地方让我想起当年去芝加哥拜访时的感觉—仍是那种粗枝大叶、不太讲究的氛围。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好几个办公地点，还有一些在其他城市，在洛杉矶也有一处。“你先自己转转。我处理完几件事咱们就一起去吃午饭。”没等我回答，他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听见他在那边和两位手下雇员快速地说着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立哲语气自豪地向我谈起他的商业成就。由于他的参与，中信出版社这两年已经在出版圈里名声大噪。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版了几百种图书。这令我记起北玲曾经说过的话：“立哲唯一感兴趣的号码就是特大号。”我问他是否会考虑出版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政治图书。

他说：“目前我还不想碰政治。我也不会考虑那些印数在5万册以下的书。”他举了几例他引入中国的畅销书，比如《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杰克·韦尔奇自传》等等。

我问：“除了潮流与市场，你还有别的什么指导原则吗？”要知道，此人可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理想主义和勇气的化身呵。从他嘴里听到与如今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们没什么差别的话，我不免感到异样。以他为代表的那类出版物近来已经饱受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大量涌进的引进版图书通常翻译得仓促潦草，却伴有高强度的商业促销活动，这使国内的一些好书受到排挤，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立哲对这种担忧似乎并不在意，他继续讲述读者对这类图书的需求：“我认为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产生了精神危机。比如，在成功与失败的压力之下，人们开始分化了，开始怀疑在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纯粹的情感还有没有价值。”不过，他说，“我不能对这些问题想得太深。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一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我带着一脸坏笑，突然问了他一句：“如果中国下一次的潮流是一个纳粹政权，你会怎么做？”

立哲看起来吃了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说：“我当然不会去弄那个潮流！到那时候我肯定会去弄抵抗运动之潮！就像在“文革”当中那样：我没有打政治牌，我打的是知识牌！”

他所说的“弄潮”，是中文里一个古老的说法。在风浪大的地方，比如杭州的钱塘江，几百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蛮勇大胆的人专门在涨大潮的时节在浪潮中戏耍表演，当地人称“弄潮儿”。中国古代诗人以惊叹之语描述这些弄潮儿：他们高举彩旗，在险象环生的漩涡中游泳、翻筋斗。多少年来，孙立哲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时威风凛凛、光彩照人，有时则差点儿被中国历史洪流中某些不可预卜的漩涡淹没。无论是在陕西窑洞里做手术，在芝加哥包饺子，还是在北京做出版——在孙立哲的生命里，弄潮始终是他内心最不可抑制的一种冲动。他决意证明自己的随机应变与多才多艺，证明他永远能够在他选择的每个领域里迅速行动并取得成功。

北玲去世一年后，立哲再婚，娶了一位名叫张瑾的年轻下属。她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并照顾北玲留下来的两个孩子。立哲在洛杉矶地区买了两套房子，大的一套在北郊，面积极大。他告诉我：“孩子们可以在客厅里骑自行车，在外面打高尔夫。有一次，我在房子周围种了 30 棵苹果树。”不过，立哲的各项事业铺得很开，是个空中飞人，住在家里的时间有限。他承认自己不属于“居家男人”。于是，年轻的妻子担当起了家务，并负责打理他们在美国的公司的日常业务。他在北京又买了不少房地产：8 套公寓、2 套别墅和 4 套写字间。在每个地方，他都给自己预备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1999 年，因为中国的生意发展缓慢，他回洛杉矶与家人共度时光。他把那段时间都用在了高科技股票交易上，最终亏损了 100 多万美元。“这迫使我重新把重心放到在中国的业务上。”

2003 年，我搬回到北京后，立哲和我有段时间没见过面，因为他频繁旅行，很难找到他。但我不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被迫离开中信出版集团。就像中国商业活动中通常的情形那样，这里面的细节扑朔迷离。不过，立哲似乎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先是一位中信高管转去国家银行就职，使立哲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接任的出版社社长认为合资组合的框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已经意义不大，便开始着手排挤立哲。他的同事绕开立哲，直接与他的许多国际商务客户建立联系。几个月后，新团队就将立哲完全排除在外了。

出版社社长如此行事，可能得到了老板们的授意。由于立哲的努力，中信出版集团已经大出风头，但它无法接受把这功劳记在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的名下。出版社的名声意味着，其高管们如今有希望因此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一旦母公司的管理层意识到出版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就想把它捏在自己人的手里。

据他的朋友们说，被排挤出局这事对立哲的打击很大。史铁生和他的妻子告诉我，立哲甚至避开了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史铁生说：“我不认为他能够承认失败。他从来都是一个赢家。他必须要赢。”

我再与立哲见面，是在北京东方新天地的咖啡厅。看着他一副疲倦、憔悴的样子，我暗自心痛。但没有几秒钟，他那旋风般的活力就把我卷了进去。原来，为了准备考试，他头天晚上彻夜未眠，当天上午刚刚参加了一门大型考试——那是他当时正在攻读的四个硕士学位中的一

个。“真是精疲力竭！”他说着，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份咖啡和一块巧克力蛋糕，尽管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餐了。我刚吸了几口西柚汁，他已经风卷残云把蛋糕一扫而光，一边迅速地把他的近期的商业活动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他刚会见了亚马逊网站的几位高管（于是我知道，立哲创办了一个中文网络图书销售的服务），此外还有在美国开办出版业务的新计划。

午餐时，立哲向我畅谈未来。他点了小乳猪、豆豉牛肉，边吃边说：“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领域将成为热点：伦理、法律、医疗保健。你明白吗？我说得对吗？那好，我正在朝那儿进军。”这就是他研究法律的原因。他正计划在中国开办几所医院，他正在筹办另一家合资出版社。他甚至将目光投向英文市场，打算出版中国经典作品的英译本和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指导用书。他说：“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增长的速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迅速。”这一次，他要在美国注册公司，这样他的合作伙伴就无法“篡权”了。

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中信事件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冷静地回答说：“是的，他们想玩我。”他说这与中信高层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关。我问他是否会起诉中信。“嗯，那绝不是一个小案子。”他强调说，“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小蚯蚓也能掀大浪。”我早就听说立哲前几年损失了一大笔钱。他这次告诉我，他把洛杉矶的两处房产都卖了来帮中信做那些项目。他的家人搬回到芝加哥。不过，他明确说他的财政并没有问题；最要紧的是，他在中信的项目上投入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

吃过午餐，我到他的公寓逗留了片刻，这里有我看到过的他的每一个“家”的那种“临时”气氛：书架上、桌子上、地板上、纸箱里，到处都是书。一个表妹在帮他清理。然后，她又帮他收拾行李——立哲第二天就要赶早班飞机回芝加哥，而他甚至连上次外出旅行的手提箱还未打开。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周围仍然是成堆的书。立哲讲了许多学习的乐趣：重新做学生是件多么兴奋的事，可以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一宿一宿地读书，一个新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敞开了。

不过他阅读的一些书却吓了我一跳：酷刑与惩罚的历史；一套《黑镜头》系列丛书，每本都是表现战争暴行、饥荒和其他心理创伤事件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几本关于毛时代大清洗的回忆录。他解释说，他发现描述 1950 年代党派政治的书很有启示性，让他不断地想起中国今天的商业运作。他说：“那种相似性简直令人震惊。”同样的拉帮结派，同样的权力投机，同样的突然袭击，同样的赶潮流追时髦。“其实他们玩的还是从前那一套政治手腕。”

他近来也一直在阅读中国历史书，并问我是否知道袁崇焕的故事。袁崇焕是明末名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战役中多次获胜。但他最终沦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某些对他心怀嫉恨的官员设谋陷害，使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他被处以最可怕的极刑——凌迟。刑罚一连持续了好几天，刽子手在他身上刮了 999 刀却不让他死掉。普通百姓误认为他是一个抗敌不力的卖国贼；他们在监狱门口排成长队，人人争着获取袁的一块肉，下酒吃掉。我猜想，是否立哲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位现代版的袁崇焕。

然后，他告诉我，在攻读 MBA 学位期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突然明白，他们所教的东西与我学医、行医的理念正好相反。医生治病救人——这是医生的人生意义。但在这儿，他们却教给我们如何打击他人，如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打败对手，如何成为最强势的动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用漂亮的言辞包装起来了。不过，基本信息是残酷无情的：为了成功你必须杀掉那些弱者。”

这位“文革”时代的青年英雄决心要弄中国式资本主义之大潮；这一次，他明白他不能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某种不确定的表情。“要把所有这一切全都理顺需要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会破局。”

后记

孙立哲继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从事着出版业务。同当年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不同，经过时间考验，他与其他几家出版社已经结成既稳定又有可观利润的合作关系。最成功的是华章图书出版公司，它是立哲的万国出版集团（总部在芝加哥）与北京的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合资公司。通过立哲的帮助，华章已经与许多重要的国际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工作关系，持续地为中国读者引进了一系列教育与职业领域的畅销书。它在IT类、经济类和管理学方面出版的图书使其跻身于中国行业领先之列，多年来一直引领着市场潮流。新近创办的“华章心理学图书”系列，则反映了立哲在卫生保健和心理学方面的个人兴趣，出版了这些领域的不少新书。

也许，出版业只能算是立哲的主要生计，他还一直在参与各类其他项目，比如给地方银行做顾问、组织学术会议、到大学讲课、买卖房地产、经营茶园等等。与此同时，他仍在世界各地进修法律和商务课程。想追踪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外出旅行的频率实在太高。2010年夏天，我重新与他联系上，费了不少心思才将他的生活与事业中那些纷繁的线索梳理出了一些头绪。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在经商的同时立哲已重拾旧业——帮助病人与弱者——这才是他的真正激情所在。有一天见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机与一位患者通短信。“我现在是一个网络赤脚医生，”他告诉我，“我一直在治疗癌症病人。”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医疗人员和设备，他怎么做这事呢？然而，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后，我发现，立哲讲这句话不仅非常严肃，而且事实上这项工作对他而言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他正在做的事，其实就是为那些危重癌症患者提供医疗建议和某些非常规的替代性治疗（比如有争议的科莱毒素[ColeyFluid]），而这些患者在目前的主流医疗机构中已被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立哲还因此失去了一个赚大钱的工作。2009年，他在一家大型的中国民营医院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兼经营决策委员会主席，薪水丰厚。在此期间，立哲开始筹措改进这些医院里癌症治疗中心的服务，并亲自治疗癌症病人，包括为穷人提供特别的免费服务。他使用的许多药物尚未获得国内审批通过；有些药甚至是立哲在自己的北京公寓里亲手制作而成。药物很有效，又是免费发给病人，还有谁会干这种事呢？然而，这种方式却从根本上挑战了城市医院传统的盈利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哲的行为相当于在现代化医院里当赤脚医生！所以也不奇怪，集团方面发现此事之后不久，就开了董事会，以违反规则为理由罢免了立哲。

从那以后，立哲决定尝试做一名网络赤脚医生。很多癌症患者通过口口相传找到立哲，然后通过网络口述病情，获得他的建议和指导。这是体制边缘处一个危险的灰色地带。立哲从传统医院和医生们停止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他倾听、分析、提出治疗建议，并帮忙找药，一切全都免费。有时，如果病人太穷，他会帮助付药费。他安慰病人和他们的亲人，直到最后的阶段，甚至在病人去世之后，他还会给家属做心理工作。

倾听这些故事、阅读那些病人亲属发给立哲的感人至深的感谢信息，对我是一种非凡体验。

钦佩之余，它也让我从一种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立哲的许多商业活动。比如，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立哲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时间以至于个人资金，去谈判推动在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一所新型医疗中心。他为当地银行提供业务咨询，与那里一所国有大医院的高层领导建立了友好关系。显然，他仍在为实现他的最终目标而努力：他试图创办的医院，应该能够为那些通常走投无路的危重病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他一直在可能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来帮助那些生病的人。不久前，他帮助组织了一次关于积极心理学与幸福主题的国际会议。在会上，他说：“人生幸福的真正来源并非为自己谋利，而在帮助他人。”

大会在立哲的母校清华大学举行，他的话让我想起 2007 年那部拍摄他重回陕西的纪录片。凤凰卫视摄制组一路跟随他的脚步，拍摄他阔别 29 年、第一次重访陕北农村。显然，当年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给村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他，在丰盛的宴席上和他满怀感情地交谈。影片回放了年轻的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的片段，接受采访的当地老农民讲述了立哲当年治病救命和遭受政治迫害的故事，还有立哲用陕西方言敬酒的场面，这一切都既感人又很有揭示意义。正如立哲的一位老友所言：“这么多年过去了，立哲的基本信念依然未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他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他当年在陕西农村时所相信的东西。这也是他今天仍然相信的信念。”

我认为，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仍然在实践着这种信念。

此文原为查建英《Tide Players》（《弄潮儿》）一书中的一个章节，原标题为“The Barefoot Capitalist”“赤脚资本家孙立哲”，中文翻译经过作者修订。《Tide Players》，2011 年 4 月纽约出版。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英文名：Enemy of the State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 0.1 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志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 11 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〇〇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翼翼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 C.D.P 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向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

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一一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 40 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 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一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条，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新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 1979 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 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 C.D.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 C.D.P 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 Ludvík Vaculík 在一九七〇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〇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 T 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 80 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 4 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 and 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 C.D.P 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〇〇

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 C.D.P 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 C.D.P 被提及是在二〇〇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 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 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 20 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

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生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二〇五〇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

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变化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 CDP 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 C.D.P 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 C.D.P 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 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 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十五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想法是：中国会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〇〇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里，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要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二〇〇八

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 13 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 *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 2007 年 4 月号] 作者：查建英

摘自《华夏文摘》

一篇最严肃的文章

最近看到朋友转来的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心情沉重。这是我近年来见到的最严肃的一篇文章。

跟查有过几面之交。初次见面是在 70 年代，那时她在北大读书，有一次来聊过天。记得当时她才 20 上下，梳两条大辫子，美丽热情，青春的活力从全身向外发散。后来我去美国读书，她父亲还让我给她捎去一套书。再次见到她已是过去的这个冬天，新周刊颁发年度新锐人物奖，我们两人坐一辆车，她获奖是因为《八十年代访谈录》，我则因为去年的一些言论。

对于她的哥哥，她当时并未提及。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他的遭遇。现在人们普遍转向享乐，只有她哥哥这样的人还在为理想献身。他确实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惜我们的时代并不需要这样的英雄。人们抛弃了他，或躲之惟恐不及。可是他并不在意，仍然像唐吉珂德那样向风车发起认真的攻击。

所长是十七大代表，回来在讨论十七大时，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政治改革要等到什么时候？他的回答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民主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明白，领导人也都懂，只是要慢慢来，不能让国家乱了，影响发展。

我想，这就是答案了。中国落后了一两百年，实在脆弱得很，实在输不起，耽误不起。谁也不能冒把国家搞乱的危险。因为民主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国家，要搞试验要特别的谨慎。这是一个不能试错的试验。一旦搞坏了，一耽误没准又是几十年。苏联人轻信了美国人的“休克疗法”，结果经济发展一下落后多少年。虽然政治上比我们好得多，但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就远远不如。别的国家不会管你，你强大了，他们就高看你一眼；你贫困，打内战，他们低看你一眼。没人真为你着急。中国的事情还得靠咱们自己来办。邓小平确实聪明，他让大伙把意识形态论争先放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他这个人直觉真好，知道怎么对中国最好。从黑猫白猫论的提出也可以看出他的直觉有多好。如果他不是一个直觉的天才，他也不会在三起三落之后，最终把中国引上正道。

其实，查建国和邓小平的区别就是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大家都是为了把

中国的事情搞好。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如果大家都冷静下来，矛盾不难解决。

【国家仆人】

Servant of the State

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

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还是一位护教者？

BY JIANYING ZHA

作者：查建英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的最后一天，而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荣誉嘉宾，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长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开幕。钢琴家朗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的展示以及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76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仪表整洁，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曾经的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发展非常快，读者的品味也是，”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的评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拿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比较：低价，大量，低附加值，没有品牌。很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博客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老化的处理品，一个僵化的体制的代言人。

这些谴责让我们想起1990年代王蒙所陷入的争论。1994年，来自南京的年轻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但当说真话变得危险的时候，他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王蒙。

王蒙用一系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坚持说年轻的批评家是在追求名人效应，是红卫兵风格，

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声名。但王轻蔑的语调相当刺耳，尤其是当他攻击从文学教授变成人权活动家的 LXB 的时候。在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标题中的“黑驹”）是 LXB 的廉价翻版，LXB 则是前一个十年的“黑马”。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中，他是一个英勇的活动家，后来被监禁一年半。整个 90 年代，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之间进进出出。由于身处警察监视之下，被禁止在中国从事教学和出版活动，刘只能为香港或海外的异议杂志写作，被贬抑在边缘化的异议分子群体中艰难生存。

在文章中，王蒙无情地嘲笑 LXB：大约十年前，文坛出现了一匹黑马；他摆出了一副庄严的姿态，仿佛叱咤风云，可轻易击退千军万马；他高谈阔论在刻薄地提及文革之后，王蒙下结论道：“他曾是一时之雄，但现在又在何方？”

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用他全部的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囚徒犯？很多人觉得，王蒙已经沉沦于人格谋杀。北京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年轻人眼中，王蒙完了。”王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声誉再未能完全恢复。

在中国文化生活中，这是那些几乎相当于地壳滑脱（山崩地裂？）的时刻之一，一条断层线变成了一条鸿沟。王蒙可以被讥讽地刻画成一个献媚的诗人，什么也不是；他的对手 LXB，则作为一位被动的受害者，什么也不是。这种极端的对照提供了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重点是在炫目：这种论断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错的失败者。

我从 90 年代早期就都认识了他们两人，而且，在王蒙去年在法兰克福的评论引发的怒潮中，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我的失望。王的回复很简洁：“没事。让它去。我没有时间来为这类事情担心，而且我早就习惯了。谢谢。”

两个月后，2009 年 12 月，某中国法庭判处 LXB11 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的主要犯罪行为是合作起草了 08 宪章，一份亲民主的宣言，呼吁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赋予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该文件首批由 300 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署，包括我在内。后来全球有数千中国人签署。如此重判引起了国际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什么反应。我再次给他发邮件。这次，没有任何回复。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离开文化部之后不久。尽管他拥有国家级声誉，我却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在两次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末期左右两极，他都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是中国的部长中唯一一个拒绝参观探望天安门广场上“英勇的战士在粉碎反革命动乱分子中受伤的英勇战士”的人，这一背叛行为使他失去了政治宠信。然而，由于他采取可能的最谦恭的形式（请病假），这一行为没有为他在反叛者中赢得尊重。强硬派分子和异议者等人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王蒙没有简单的答案。20 世纪政治史上最混乱的几十年让他对混乱有一种坚定的厌恶（逃避？）。

献媚者也曾经是一个反叛者。王蒙 1934 年生于北京，父母来自河北省一个闭塞的乡村。3 岁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北京。王还记得必须向城门口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卫兵鞠躬的情景。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和日本学习，迷恋现代和西方的所有事物。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一位梦想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对实际事物和办公室政治却难以应对。随着事业的失败，他的大家庭挣扎于债务和饥饿之中。家庭并不平静：在吵架时，王蒙寡居的姑

姑会把一罐热的绿豆汤泼向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喝醉后会脱裤子，令女人们尴尬不已。

王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曾获得作文和辩论的优胜，随之而来的是学费减免。老师喜欢他。但他偷偷地阅读左派书籍，逐渐被激进思想所吸引。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早期的政治倾向显露出一首第三流的诗中：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很快，共产党选拔了他。他开始作为一个中学的活动分子工作。党接受他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才 14 岁。一年后，党占领了中国。“从今天开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举国欢腾。人民共和国最初日子的狂喜仍旧是王蒙最亲切的记忆。他为充满激情的游行、阅兵、同志式的集会和歌声欢欣鼓舞。他惊奇于北京如何能在一周之内将庞大的垃圾清理干净，这曾是古都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他相信革命已经把缠绕父母、令中国落后的腐朽生活方式彻底清除。

王蒙被派到共青团某区的支部，其时还只有十几岁。他一直喜欢文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一部小说上——用抒情的形象刻画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混合着天真革命激情的浪漫史——经过很多次修改之后，这部小说被编辑枪毙掉了。但当他的第一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于 1956 年发表时引起了轰动。故事的场景设定在党的某个区委，刻画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干部。跟王蒙自己很像，他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包括各种类型：萎靡不振的、精明的、腐化堕落的——发生了冲突。在文学本质上仍为党的宣传服务的年代，没有对党的官员的形象进行美化，是很不寻常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们在报纸上谴责王蒙怀有不健康的怀疑主义和布尔乔亚的伤感。考虑到时代气氛，王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争议，介入进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毛赞扬王蒙的小说是一部“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毛历来担心革命热情会被官僚主义腐蚀。“我不认识王蒙，但批评他我不服。”毛谈及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卒，“难道官僚主义在北京不存在？我支持反对官僚主义，王蒙很有文才。”

毛泽东的话不仅送来了最高级政治保护——攻击停止了——也使王蒙声名大振。王蒙似乎时来运转了。他很快与崔瑞芳结婚。崔是王蒙通过共青团的工作认识的年轻女子，王写了很多热情的情书追求她。她比他大一岁，对他的文学才能深信不疑。

政治上的缓和是短暂的。几个月后，毛发起了反右运动。在接连不断的狂热中，50 万人被告发，送进劳改营。王蒙的地位过于低微，不值得主席的持续关注。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四年中他在白天从事低级的劳动，晚上参加“自我批评”会。

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跟他一样是党的真正信徒和忠诚者。他们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离婚甚至自杀。王经历了一段濒于崩溃的自我怀疑时期。他说服了自己这是对他曾经享有的特权的报应，并拼命劳动来以苦力救赎自己。后来他写道，背石头和种树改善了他的健康，从童年时期开始他一直是纤弱的。

1962 年，王蒙被允许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的身边。他和妻子都得以从事教师工作，并且他们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第一次能够共同生活了（在下放期间可以偶尔回家探望），尽管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王蒙仍然渴望从事写作事业，渴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他的文章几

乎没有被发表过，小说被批评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对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而那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新文学”主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与苏联决裂，不断地整治党内的叛逆者。政治气氛再一次阴云密布。

1963年秋季，王蒙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是中国的穆斯林。他是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但调动也使他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们仅有的物件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旅程花了90个小时。

“你觉得我们会在那里呆多久？”列车驶出北京的时候，崔瑞芳问道。王蒙回答：“呆几年吧。最多五年。”他们在西部边疆呆了16年。

新疆适合王蒙。他惊异于那里的美丽：壮丽的覆盖积雪的山脉，多石的沙漠，冲天耸立的白杨树，蓝得像天空一样的湖泊。他被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即使农民们吃不饱，他们仍会种植玫瑰。他很喜欢当地的主要食物：馕和羊肉，为凄美的维族歌曲而感动，心醉于他们语言中的“和谐韵律”。当他发现自己成为“封杀”（官方对某个人和他的作品的封禁）的对象时，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维语中，这对于汉族是很罕见的，为他在当地的村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崔和王给她取名为“伊宁”，那是他们居住过的维族城镇。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红卫兵到处抄家，焚烧书籍，殴打老师，经常有时把他们虐待致死。在伊宁，王蒙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个人信件。但地理距离确实帮了他的忙，运动抵达遥远的边境小城时，激烈程度已大为降低，王蒙还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一位保护他的年长农民说：“不要怕，老王，任何国家都需要三种人：国王、名妓和诗人。你迟早会回到你的诗人岗位。”

1976年，随着毛的逝世，文革终于结束。尽管政治氛围仍然不确定，但王蒙开始写他的文章，并让它们流传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风险。1978年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家里包饺子，看到妻子冒雨冲进家里，挥舞着一本刚刚邮寄过来的《人民文学》。“你的小说发表了！”她大喊着进来。王蒙用沾满面粉的双手抓住杂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不到一年以后，王蒙恢复了党籍，并且，在被搁置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得以出版，大受欢迎（后来被改编成一部受欢迎的电影）。随后，北京的作家协会来了一纸调令。1979年6月，王蒙全家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大帮维族和汉族朋友来到火车站送行。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崔瑞芳双手掩面，无声泪流。

王蒙从作家协会领取每月的工资，获得了补贴住房。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作和发表。全家搬进了一座嘈杂的大楼，有一间100平方英尺的房子，走廊里有一个卫生间，外面有一个高音喇叭会在晚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夏天透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他会把衬衫脱掉，只穿着裤衩，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经过数十年的压抑，写作在中国有一种巨大的渴求。文学杂志喷涌而出。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150万份；其他主要文学杂志分享着数量巨大的读者群。王蒙用他精巧塑造的纯朴、真诚、在黑暗年代努力挣扎的信徒形象引起了共鸣。他也逐渐变成一位精明的文化官员。作为一名机敏的演讲家，王蒙能言善辩，并且政治技巧纯熟，他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

理事会。他推动了更多自由化的政策，但也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保持着热情、恭敬的关系。1985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小说《活动变人形》（标题指一种玩的时候可以改变形状的日本玩具）出版。它被广泛认为是王蒙最好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的北京，王蒙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刻画了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小说描述了两对陷入不幸福婚姻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逐渐树立的革命信仰。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为中国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当有人评价说王蒙“是个好人，但当部长没有取得任何成绩”时，他反驳道：“但我取消了对夜总会的禁令！”王肯定是一个自由派部长。他推动艺术领域更大的开放和多元化，将西方的艺术家例如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引入中国演出，并且尝试鼓励国家资助的企业采取市场化的措施。

然而，1980年代末期的动乱使这些姿态显得苍白无力。文化热正在兴起。“解放思想”是当时党的一条口号，但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接受这一理念的程度远远超过官员们的盘算。他们没有时间理会王蒙的社会向善论。那个时期属于像LXB这样的人。

刘1955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的知识分子。他在内蒙度过了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毛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送到了那里。刚成年的时候刘是一个不熟练的工人。毛泽东死后，他到了吉林上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研究，1984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80年代中期，他引起了一场对前一代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刻薄批判的风潮，指责他们的作品是模仿和平庸之作。有一些更为戏谑的断言是1988年与一家香港杂志进行的访谈中提出的：“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变成香港今天这样。”

欣喜地堆积着愤怒，他将孔子称为“庸才”，并且呼吁中国全盘西化。他将作家、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高行健贬为一个高级模仿者。他宣称中国大陆的作家“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对于像刘这样的反传统者，文化批评和政治改革是同一场战斗的一部分。

文化热的喧嚣场景与王蒙并不是那么相投，他观察到一种“弥赛亚情结”的现象，即幻想文化和社会的转变可以通过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觉察到正是同一种幻想激发了中国革命。王蒙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改革的乐观前景及其阵痛，《坚硬的稀粥》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最高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早饭总是吃稀饭和咸菜的大家庭，爷爷是受人尊敬但是思想开放的家长，他决定把菜单的决定权交出来。家里用了四十年的老佣人接过了权力，她开始省吃俭用，为了爷爷的健康，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参蜂王浆。随后，紧跟时代潮流的孙子开始提供全西化的早餐，部分家庭成员偷偷地加了中国的调味品，引起了一些消化问题。很多其他形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尝试，包括民主投票。人们开始各吃各的饭。重孙子去了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知识分子的儿子和他的妻子移居国外。无论如何，最后，他们都回归稀饭的早餐，多么朴素，多么温柔。

在1989年4月中旬的时候，谁也不能保持温柔的心境了。几年前被迫辞职的党的自由派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之后，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对于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时刻。当时，LXB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了解到抗议情况后，他立即放弃访问，返回中国。

但当示威继续发展，王蒙感到的不是鼓舞而是害怕。有一次，他花了7个小时和20岁的女儿谈话，随后陪她去她上的大学，等在校门外面，直到她说服了班上的同学不去参加示威。当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和埃及之时，情况迅速恶化。6月4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1980年代的一代——理想主义的、纯真的、脆弱的——走到了崩溃的终点。

大屠杀毁灭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脆弱纽带：一部分人放弃了党籍，与当局决裂；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或者被投入监狱。王蒙保持与强硬派之间的距离，但他没有作出退党声明，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在激进派的眼中，他的行为和任何其他畏缩的主政官员并无二致。

他请了病假期间，他在海滨城市烟台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剩余时间，创作情绪化的、隐晦的诗歌，哀悼一个时代的消逝。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式终止了王蒙的部长职务。

我与王蒙相识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次跟他谈起过天安门。当时我告诉王蒙外界关于他“软着陆”的评论。他纠正我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做了360度后空翻，双脚落地。’”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笑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惬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中，王蒙一直是调查的对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长们，与他拉开了距离。保守派的出版物公开批评他。伴随王蒙新受到的打击，强硬派认为他的《坚硬的稀粥》实际上是隐晦地攻击邓小平，邓虽然表面上退居二线，事实上仍是当时的最高权威。

很难说清这种指控有多么混乱（令人不安）。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射的传统，作家们用寓言来批评高级官员。事实上，文革是直接因为一起疑忌引起的：1965年，一名党的知识分子写的历史剧被批评是隐晦地攻击毛泽东。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但毛极为重视，他命令报纸谴责这位作者（他最终在监禁中被殴打致死），自发的狂热逐渐变成全国性质的运动。因此，当对王蒙小说的指控开始甚嚣尘上之时，王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写信给党的主席江泽民；提起了诽谤诉讼；并且，破坏性地，他公开了一份其强硬派对手——清洗之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新任头头——在王蒙刚担任文化部长时写给他的献媚信，那是当他还是一个新任命的文化部长时对方写给他的私人献媚信件。

很多自由派为王蒙大声喝彩。但其中不包括LXB。刘后来写道，王蒙在公布信件时没有尊重关于隐私的规则，”因为他认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段，但他似乎没有明白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流氓。“这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原则声明，漠然无视王蒙面临的受迫害风险。

“我在封杀中度过了20年，”王蒙对我说，“那是一种可怕的状态。”这次，封杀很短暂。1991年的秋天，王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举行的作家活动。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政协是政府的政治协商机构。他的福利和补贴被保留下来，像所有按官阶排位的前任官员一样。在被处理期间，王蒙仍旧受到国家的礼遇，包括他带有院子的住房（后来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书、一辆轿车和司机。

王蒙心怀感激地恢复了全职作家的生活，写小说、短篇故事、批评、诗歌、评论、报告、自传，甚至翻译了一些约翰·奇佛的小说。在一系列精彩的关于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商业化

“的文章中，王蒙雄辩地捍卫了文化的多元化、市场改革和中国威权传统的终结。他也为一位非常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年轻小说家王朔进行辩护。王朔的”痞子风格“被一些人指责是具有破坏性的。随后就是 LXB 的攻击——臭名昭著的”黑马“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强烈的集体抵制。

我初次见到 LXB 是 1991 年初，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时髦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名热衷于附庸风雅的白痴。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可能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他批评的矛头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作用，不是简单的啦啦队长或鼓动者的角色：他为了学生们从广场和平撤离，当真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他可能是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唯一一位出书揭露这场运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一道德失败的人。与王蒙毫不留情地评论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类似，LXB 详细解剖了困扰学生激进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同志们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和宗派主义。他对自己也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王蒙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对 LXB 这样被国家几乎完全压制了的人摆出这种居高临下的不屑？上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朱学勤，当时曾写了一篇关于王蒙的讽刺文章。他告诉我说，他仍然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原谅的。在他看来，王蒙的行为算是落井下石。

这件事情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十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当时主要担心的是经常会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他时刻提防着任何可能把中国带回“极左路线”的思潮。对于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勇气的看法，他感到特别愤怒：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迫害，甚至被处决或被迫自杀。“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他问道。但王蒙同时也责备自己在这些辩论中有点太缺少对于对方的同情。

王蒙在九十年代中最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小说，他称之为“季节”系列，其中最后一部完成于 2000 年。它们构成了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虚构编年史。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颇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让位给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党实施了不争论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媒体严密地捂紧盖子。随着大众转向积累财富的买卖——正如邓小平所说，“致富光荣”——文学期刊发现自己的读者群不断萎缩。一种充满活力的，不断被引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流行文化正在崛起——这进一步削弱了大众对于严肃小说的兴趣。但是，即使在文学圈内，“季节”系列也没得到什么赞扬。评论家们抱怨说，王蒙的叙事风格，已从鼎盛时期的动感与机智，变成饶舌与卖弄。他的语言缺乏精致与内敛。他的描写满是夸张的形容词和成语的堆砌，成为混沌的流水账。

有一次，我与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时候，她提到“季节”里的某一部小说，问我如何。我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本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无法读完它。王蒙很快岔开了话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他明显觉得这些小说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人理解。他认为，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充满坦率和同情地写起过中国革命的经历。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否是一部由于主流评论界改变风向而失宠的重要文学作品，下面节选自书中提到毛泽东的一长段文字可以算是一点样本：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的狂欢，是毛泽东的诗化狂想曲。。。它是一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先锋

派思想的狂欢节。它也是一场意志力、概念和语言的狂欢节，是为了搜寻一点新意而创造的历史。。。毛泽东让年轻人短时间把他们自己解放到极致，摆脱所有束缚和规矩。它令所有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感到兴奋。它是有一点残忍。可是，难道那些服从和僵化对于生命和青春来说不残忍吗？文革的确是彻底地激动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柏林墙会被西德红卫兵的海报所覆盖，为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成立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法国文化部长兼作家马尔罗会十分钦佩毛泽东，以及很多年后，为什么遍布世界的拳击迷会通过电视直播看到泰森在他的胳膊上纹上了毛泽东画像。

撇开散文的雕饰不说，读者对于文革只是“有一点残忍”的说法会怎么想？一位以简洁风格而著称的当代中国优秀小说家曾经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希特勒”，他远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尽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是与毛泽东绑在一起的，对他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也仍然被禁止，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暴君，他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即使在美学意义上，毛泽东也已被广泛谴责：评论家们认为他对于破坏优雅精致的普通话，代之以粗暴刺耳的口号负有责任。有人认为，在共产党统治几十年后，毛文体已严重污染了中文写作。

这种争论是有后续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在有关毛泽东遗产的争论中，哪种解释可以占到上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节”系列明确表明的那样，王蒙对毛的评价远远不到谴责的程度。“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毛泽东，过于简单化了，”王告诉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的好事和坏事都取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一个政治和文学天才。你了解他的诗词和书法。而且我认为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在 1949 没有占领香港，尽管当时他大概派一个旅就能办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和苏联决裂。因此，他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开的窗口，使中国跳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你要谈毛泽东的暴行？如果你还记得所有在中国衙门里的酷刑折磨，历代的那些凌迟处死的话，那么，你清楚他前面肯定有很多的先辈！不过，现在还不到真正讨论毛泽东的时候。”

其他作家对于王蒙不愿谴责毛泽东这件事，有着各种解释。朱学勤说：“毛泽东曾经帮助过王蒙。王蒙有感激之心，这很正常。然而，在考察了毛泽东的好和坏之后，最终应该摒弃他才对。王蒙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于算计。”其他人则认为其原因是和年代有关。“在王蒙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来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告诉我。“他们往往可以对自己亲生父亲非常严苛，但绝对忠于其精神之父。王蒙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这样说，因为如今在知识分子中，谴责毛泽东是相当时髦的事情。他那是真正的忠诚。”

有一次，王蒙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是否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王蒙呵呵笑着说，“洗脑？你认为有人能取出我的大脑，并给它洗一洗？”他接着解释说，是他选择了去接受革命和共产主义。然后，他引用了北岛的一个著名诗句：“我不相信！”“那么，”王蒙在屏幕上脸色凝重，声音略有上升地说道。“我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我们相信！”

北岛是我这一代人的艾伦·金斯堡。我们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文革之中。他早期的诗歌主题——异化，怀疑，通过浪漫的爱情实现个人救赎——涉及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所有基调——从毛主席的红孩子到伤心失望的成年人。但是，看到王蒙捍卫他这一代人的尊严和他们所选择的信仰，我很受感动。从王蒙的誓言里，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也仅是愿意修改，但不肯放弃他的信念。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王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

作家之一，已经为自己的青春狂热承担了个人责任。中国人在写到毛泽东的清洗运动时，往往是描绘无辜受害者的痛苦。但王蒙则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几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积极参加了运动。这样不留情的书写体现着诚实和勇气。然而，为什么他仍还要重树这个带来如此多破坏和妄想的信仰呢？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王蒙在北京的三联咖啡馆里一起喝茶，当时他在那里刚刚做完新书签售。身着深色休闲裤和一件带有中式衣领的黑色外套，王蒙显得既机警又放松。我提起外界对他不断的批评，说他为中国政府做辩护。“丘吉尔曾经说过，‘我支持民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更糟，’”王蒙笑着答道。“我对中共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变得更糟。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如果由你来治理中国，不出三天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你也会丢掉脑袋。’所以，我不是在谈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其必然性。让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访问北川的情况——那里是 2008 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我站在那里看着废墟，心惊胆颤，它绝对可怕！专家告诉我说，这样的大地震是由地下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运动所造成的。因此，当它终于爆发时，肯定是天摇地动。”他呷了一小口茶，紧紧地盯着我。“你懂我的意思么？这跟中国的革命是一样的。”大饥荒，文革，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红卫兵’狂热，这些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种种，对他来说，都是地球母亲不可避免的爆发：虽然可悲但也是某种壮观。

“如果当初共产党没有胜利，”我坚持道，“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可能会少受些苦呢？”

王并不承认对此后悔；他认为那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历来都是通过暴力的，”他说。“最令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和革命！”

我指出，尽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旧中国的社会和道德弊病——腐败和不平等——至今依然存在。

“是的，它们仍然存在，对吧？”他皱着眉头说。然后，他叹了口气。“建英，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对这些‘假如’的问题不感兴趣。”

这次谈话让我想起王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的主角姓黄，大概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黄是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他见到了老朋友，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女士。由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恐怖难以忘怀，因此一直坚持想要与黄进行“深入讨论”。黄在头脑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回答：“那些被恐怖吓破了胆的人，请你们走开。历史将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它前进的步伐。。。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你有权利感到沮丧。但我没有权利感到沮丧，因为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话虽如此，黄却对这次可能的谈话感到不安，于是安排了一次旅行，最终避开了见她。

“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王蒙从来不曾对我这样说过，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作为这个新中国的一名精英份子的自豪和责任。革命已经结束，破坏的热情已消失，党已经朝着建设性的道路转向。为什么不能积极向前看呢？正如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布礼》中，主人公充满感情所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去年夏天，我与王蒙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九天的新疆之行。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当地的作协为王蒙以前关于新疆的作品举办一次纪念活动，并给作家们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从基层收集新鲜的素材。王蒙所写的关于维吾尔族生活的小说，是一系列契诃夫风格的短篇，用简单而现实主义的语言写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是最感人的。它们没有冗长的叙述，而是专注于普通生活的细节，以及大自然感性之美；其基调是在悲剧中带着温和的喜感和黑色幽默。读完它们，你可以感觉到王蒙对维吾尔文化及其人民有着真诚的尊重。鉴于他现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不免怀疑他与他们的这份联系还剩下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很是大开眼界。自始至终，我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住在四星级酒店，享用着一顿顿的美酒佳肴，听取当地官员的讲话，观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区文化节。不论我们去哪里，当地官员和导游都陪同在左右。我们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见见当地人民。行程快要结束时，我和另外两位作家决定自己到维吾尔族聚居区转转。两小时后，当地导游焦急地找到我们，并数落起来。“你们会迷路的，”她说，“或者在小巷里被人扎伤！”每当我问起汉-维冲突的问题时，我们的东道主都会置之不理，直接换个话题。当我们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时，警车会一路护送。

当我们到达王蒙七十年代所住的维吾尔族村落巴彦岱后，一群记者围了上来，跟着他寸步不离。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走过来，把脸埋在王蒙的肩头开始抽泣。他是前任村长，和王蒙相识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两人长时间地拥抱着。然而现场林立的电视摄像机和晃眼的摄影灯光，以及大量的围观人群，让这个场面几乎有了超现实的味道。

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无意间听到了王蒙与新疆地区政府主席用维吾尔语交谈，并评论说，王蒙听起来象“一个不同的王蒙。”维吾尔族官员回答说：“噢，这才是真正的王蒙，从巴彦岱出来的那个！”后来，王蒙把这段话转述给挤满了会议厅听他讲话的听众。那些人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他谈到了在中国，某些时候即使你想成为真正的自我都做不到。他越讲越动感情，并开始在空中挥舞起手臂。“的确，说维吾尔语的王蒙才是真正的王蒙！而真正的王蒙永远属于巴彦岱，属于新疆！”他几乎是在喊了。维吾尔族听众的掌声热烈而又持久。

尽管王蒙已经有了名气和地位，但维吾尔人在跟他交流时仍然还是真情流露与发自肺腑：他们拉住他，拥抱他，哭着，笑着，跟他用飞快的维吾尔族语交谈。一天，在喀什附近某个广场上举办了一个俗气的“民间”庆典。一名维吾尔族男孩跳着舞向王蒙走来，他后面跟着一队身着鲜艳服装的歌手和舞蹈演员。王蒙也随之开始跳舞，按维吾尔人的风格，摆动起双臂和肢体，双脚踏着完美的节拍。那个男孩兴奋异常；人群中响起疯狂的欢呼。一次例行的动作，演化成了真正的欢乐之际（时刻？）。

但是这样的时刻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每天各种空洞堂皇的讲话。我常常想知道王蒙对于我们这次巡游的奢侈和造作到底有什么真实感想。

7月5日，就在我们离开新疆几个小时后，现实暴露了出来。该地区的首府发生了骚乱，起因是在中国南部的一场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的群殴事件。到骚乱结束时，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由于族群关系恶化，政府派遣大量部队进入该地区巡逻。王蒙对此事保持了缄默。

十月份，中国媒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期间王蒙在几个脱口秀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场。有一次，他说起自己与维吾尔人密切的个人联系，讲了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比如他曾和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坐在公路边，用自行车铃盖当杯子，分享了一瓶白酒。他的语气既热情，也自嘲，还有些怀旧。他所表达的是民族团结和汉维友谊。但他也清楚国家媒体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界限。他没有提及骚乱的事情。

王的实用主义让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那次他的精神颇为低落。“中国很可怜——任何领导人只要一谈民主，就会失去权力。”他告诉我。“人均 GDP 仍然非常微不足道，整个国家就是一只纸老虎。稍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感到紧张。”他补充说：“如果中国能够再有二十年时间的和平发展，那么情况会有所不同。可是眼下？”他叹了口气。“不过，至少看来我们是不会再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一方面，这位兼容并包者还梦想着社会转型。另一方面，那位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对于兼容并包的厌恶也越来越少了。我与王蒙在三联咖啡厅喝茶之前一年，我参加了 LXB 为欢迎我哥哥查建国而举行的晚宴。建国此前因为推进民主活动而被判服刑九年，当时刚刚出狱。在他出狱后的几个月里，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两个警察一刻不停地跟着他。建国毫不退缩，直言无忌地谈起鼓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计划。在晚宴上，LXB 对建国的热情进行了降温，而且后来让我提醒建国不要期望过高。他引用了一个经典的诗句：“不要‘一览众山小’！”回想起王蒙把 LXB 形容成桀骜不驯的黑马形像，我忍不住笑了。

与以前将温和等同于投降，将礼貌等同于奴性的火爆脾气相比，LXB 已经变得成熟了。即使在他征求零八宪章签名时，对那些拒绝签名的人他也能保持亲切态度。上海的一位学者告诉我，由于不愿影响到自己正在建立的奖学基金，他决定不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当得知此事之后，LXB 告诉他，他完全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一个人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俯首默许或坚决反对，是否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呢？王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而这也是关于他的争论中心。与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强调其自身的独立精神不同，王蒙并不试图把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身外的客体，”他曾这样写道。“当你喝的水和你吃的食物，所有一切都来自‘国家’时，甚至当你拉的屎都需要由政府的卫生部门处理时，你怎么能吹嘘说自己跟它有距离呢？”

王蒙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乐观，还有他所宣称的对党的忠诚（以及温和的批评），使得国家变得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如此有争议的人物的原因。《开放》杂志（一份公开反对中共的香港月刊）的编辑金钟说，王蒙让他感觉很像周恩来——周是毛泽东忠诚而顺从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是受到中国人民爱戴的人物，因为他个性富有魅力。但他从没挑战过毛泽东，从本质上说，他只是在为邪恶服务而已。”现在住在美国的一名中国诗人张尔（ZhangEr）说：“中国仍然是主奴文化：一个主人高高在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她用到的“奴才”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当奴隶的材料。”她用这个贬义词是经过斟酌考虑的。她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精英人才为皇家尽忠服务的传统中，王蒙就是一个当代的范例。

有些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则更加温和一些。其中一人曾告诉我：“如果你从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官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庸之道。”这

是儒家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避免极端化，把天下所有事物都合理对待，以取得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王蒙和 LXB 看似对立，但他们所参与的，其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LXB 从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经进化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他仍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也承认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偶尔会表现出的宽容。他在自己的审判结束时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在去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政治改革应该“渐进，和平，有序，可控”，“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而王蒙——往往从体制内部——也一直灵活与持久地呼吁开放和宽容，他的职业和文学生涯中贯穿着与强硬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两人都走向中间立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目前的状态。

“中庸之道”：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过把中国的“封建传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各种激进尝试，但是儒学以其对于德政，向善与社会和谐的强调，正在这里复兴。在流行的电视节目百家论坛上，在大量有关儒家和道家的畅销书中，以及在学童和成人阅读古文的时尚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它还体现在政府的新口号“构建和谐社会”当中，体现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发言中引经据典的嗜好中，也体现在由国家资助孔子学院在各国的不断成立中。因此，当代的官场文化——官僚体系，权力阶层，戏剧性的铿锵言论——代表着旧日帝王之道的回归。王蒙自己的思维与才干，显然是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

孔子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而王蒙本人也没有显出放缓周游的迹象。九月份，在 LXB 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前的两个星期，王蒙在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做了一次演讲。他在到那里之前曾惋惜地跟我说起，在 1989 年之后，中美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如何之少。——据他说，甚至比中美军界之间的对话还少。他自己用英文准备了讲稿，希望发言能够跨越鸿沟。在哈佛，他讲述了自己凄惨的童年，以及他在青年时期参与中国革命的经历。他讲起了自己的孙子十四岁时，他们爷俩之间的一次谈话。——他本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年龄加入共产党的。他批评孙子花了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孩子回答说：“可怜的爷爷，我敢肯定你还是个孩子时，肯定没有什么玩具。如果你的童年没有玩具，那么你只有参加革命了——除此以外你还能有什么可做的呢？”

王蒙笑着说：“我想也许他是对的。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一样。我无法想象，我的孙子辈将复制我的人生之路。但我坚信，世界上的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和好书。否则，年轻人都有权参加革命，推翻那个毫无用处的政府。”听众们大声鼓起掌来。但是他还没有说完。他脱离了讲稿，说道：“我多次提到了过去，这让我想起芭芭拉·史翠珊的歌《往日情怀》（The way we were）。”听众们笑了起来。他随即说出那首歌里的著名歌词：“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来一遍，告诉我，我们还愿意吗？我们还能做到吗？”他清醒地继续说道：“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有机会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而且能够象我以前做过的那样。”

然后，就像一位老派的、知书达礼的使者那样，他向所有在座者保证他愿做他们的朋友。这让人不忍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悔。王蒙就像他笔下的许多主角那样，确实令人想起具有儒家素养的优秀官员的形象：忠君爱国，同情百姓，鞠躬尽瘁，致力于完善现有体制，而非改变它。正如所有那些为伟大的权力和文化中心而献身服务的人一样，他的成就与妥协，也必将被众人评说。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 群：550338315

某些敏感词做替换处理。来源：纽约客

-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